

# 戰後臺灣菁英的憧憬與頓挫： 延平學院創立始末\*

陳翠蓮\*\*

## 摘要

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留日臺灣菁英滿懷欣喜，期盼儘快返回臺灣，並組織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奉獻故鄉。返臺之後，創辦了延平學院，受到當時社會極大的歡迎。但是，學校開辦不到半年，就被下令關閉。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也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被解散。

本文透過上述兩個團體的遭遇，探討戰後初期留日臺灣菁英面對中國統治的挫折經驗。陳儀政府以中國化做為教育政策重心，延平學院由留日菁英所主導，學生多數是臺灣人，被認為具地域主義與分離主義色彩。當局佈署了情治人員監視學校，並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藉口將學校關閉。中國政府對於臺灣知識菁英極不信任，禁止臺灣人插手高等教育、擁有教育自主權，這是延平學院被關閉的主因。

一九五〇年代，為了防止共產主義蔓延，國民黨政府以恐怖手段壓制臺灣社會，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雖然並無活動仍被要求解散，延平師生更在一波波白色恐怖案件中受害尤深，這是白色恐怖時期知識菁英普遍的遭遇。政府大肆株連捕殺，使得臺灣社會震懾戰慄，同時也扼殺了一整個世代的菁英人才，導致人心的背離。

關鍵詞：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延平學院、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

---

\* 本文的完成，借助於尚未出版的〈灌園先生日記〉戰後部分，及〈賴永祥先生口述訪問紀錄〉，筆者十分感謝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所長許雪姬與助研究員張隆志二位先進不吝借閱資料。其次，賴永祥先生與楊建基先生提供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成員的背景資歷之相關資料，兩位匿名審查人及許雪姬教授的修改建議，都使本文增色不少，筆者謹表達感謝之意。

\*\*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 一、前言
  - 二、故鄉情、祖國心
  - 三、黑暗中的螢光
  - 四、二二八狂燄
  - 五、白色羅網
  - 六、結論
- 

## 一、前言

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留日臺灣菁英熱切期盼儘快返回故鄉，並組織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希望貢獻所學，重建新生。返臺之後，創辦了延平學院，這是第一所由臺灣人所創辦的私立大學。戰後臺灣青年學子熱心向學，全臺僅有的臺灣大學無法提供足夠的升學機會，延平學院因此受到廣大的歡迎。但是，這所符合社會殷望的大學，卻只開辦不到半年，就因不明原因被政府當局下令關閉，而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也在五〇年代被下令解散。

早先筆者從事二二八事件研究時，注意到延平學院在戰後臺灣社會的特殊角色。二二八事件中參與的青年學生眾多，來自全省各地學校，為何獨獨延平學院被下令關閉，令筆者感到好奇；又因為對延平學院的關注，衍生出對更早之前即成立的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的興趣。對於這段幾乎已經湮滅的歷史，筆者有著諸多疑惑，進而產生一探究竟的強烈動機。從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這個團體的名稱，就可以看出成員們想要奉獻故鄉的熱情，他們返臺之後有著怎樣的遭遇？延平學院創設經過如何？又為何匆匆被關閉？研究會又為何被下令解散？筆者認為，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與延平學院的遭遇，有如戰後臺灣菁英與新來接收的中國政權互動的縮影，解答上述這些問題，有助於理解臺灣社會在戰後初期極短時間內劇烈轉變的過程。

至目前為止，有關戰後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與延平學院的研究可以說是十分

不足。據筆者所知，僅有《朱昭陽回憶錄》對於這兩個團體的始末提供了當事人的第一手線索，<sup>(1)</sup> 其次謝聰敏在《自立晚報》所發表的〈留日學生的「祖國經驗」〉難得的記述了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成員們的回憶，<sup>(2)</sup> 另外則有陳君愷所撰〈荒野中的螢光——延平學院的歷史地位〉一文探討了學校被關閉的原因；<sup>(3)</sup> 但因為受限於史料不足，以致上述論著都顯得過於簡略而只呈現了部分側面。

本文主要以近年來出土的官方檔案、林獻堂日記、各種回憶錄等史料為基礎，其次輔以當時新聞媒體報導，及對相關人士進行之口述訪問，試圖重建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與延平學院成立的經過，探究兩團體被解散或關閉的原因，並檢討其所顯現的戰後臺灣社會集體心靈抑鬱、挫折與轉變的過程。

## 二、故鄉情、祖國心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昭和天皇透過廣播宣布敗戰投降，臺灣人的命運面臨重大的轉折。戰爭結束，臺灣人的反應與所受的衝擊各不相同，但在海外的臺灣人絕大多數迫切想要返回鄉里，則是共同的心情。尤其在日本，長期的戰爭動員導致物資缺乏，盟軍轟炸與原子彈的破壞，到處殘破不堪，人心惶惶，旅日臺灣人莫不迫切萬分希望迅速回臺。<sup>(4)</sup> 面對破敗的日本，東大學生邱永漢如此描述當時的心情：「依我的想法，是巴不得早日逃離這樣的環境。為此必須儘快找機會回臺灣。……如今已經不是巨石壓頭的帝國主義日本，而是咱們自己的臺灣由自己統治的立場了。……在當時從臺灣來的留學生們無不歡欣振奮。」<sup>(5)</sup> 因為戰爭而與家鄉音訊斷絕的青山學院學生高俊明則這樣說：「戰爭一結束，我日夜想著趕快回臺灣。我很想念父母親，很想念故鄉，完全不想待在日本。」<sup>(6)</sup> 就讀東京

(1) 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1994）。

(2) 謝聰敏，〈留日學生的「祖國經驗」〉，《自立晚報》，民國80年8月1日、2日。

(3) 陳君愷，〈荒野中的螢光——延平學院的歷史地位〉，收於延平中學創校五十週年紀念專輯編輯委員會編，《延平中學創校五十週年紀念專輯》（臺北：私立延平中學，1996），頁87-93。

(4) 李汝和，《臺灣省通誌卷十光復志國籍恢復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頁57。

(5)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青春·臺灣 我的青春·香港》（臺北：不二出版社，1996），頁61。邱永漢原名邱炳南。

(6) 高俊明、高李麗珍口述，胡慧玲撰文，《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師回憶錄》（臺北：望春風出版社，2001），頁98。

醫專的許丕樵說：「我們這些留日臺籍學生頓時變成了戰勝華僑，基於現實考量及思念祖母、母親，……決定舉家返國。」<sup>(7)</sup>在長崎的彭明敏與他的兄嫂一家人，「我們決定儘快回去臺灣，而全無其他想法。……如果願意，大哥可以繼續在日本行醫，我也可以在日本最好的大學完成學業。……但是我們決心儘快離開，覺得一定得回家。」<sup>(8)</sup>經歷戰爭浩劫，殖民母國已如廢墟一般，迫切希望儘速回到故鄉，是在日本臺灣人共同的心情寫照吧。

### (一)返臺作業與東京臺灣同鄉會

儘管在日本的臺灣人歸心似箭，但因為國民政府對於臺灣省之接收工作尚未展開，遣返作業連帶受到延宕。

據估計，戰後流落海外的臺灣人約有 20 萬人之譜。其中，在日本包括留日學生、戰時被徵召的軍人、軍屬、少年工及從事各種行業之臺灣人大約有 5 萬人。<sup>(9)</sup>在日臺灣人之遣送作業，先由國民政府駐日代表處進行調查、登記，並接洽盟軍總部安排船期，<sup>(10)</sup>同時各地旅日臺灣人也組織了臺灣同鄉會協助聯絡船隻、安頓旅外同胞事宜。一九四五年十月，東京臺灣同鄉會成立，會長為高天成，副會長高玉樹，事務所設在東京丸之內會館，次年五月並與華僑合併成立東京華僑聯合會。<sup>(11)</sup>同鄉會主要工作在協助在日臺灣人國籍回復之登記與返鄉船期之安排。

(7) 許雪姬、丘慧君訪問，丘慧君記錄，《許丕樵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 116。

(8) 彭明敏，《自由的滋味》（臺北：李敖出版社，1995），頁 45。

(9) 這是簡筌簧先生的估計，參見簡筌簧，〈光復後政府接運旅日臺胞返籍之探討〉，收於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三屆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96），頁 1174。戰後留日臺僑究竟有多少人，各種統計數字從 2 萬人到 10 萬人，差距相當大。學者看法也不一，例如湯熙勇認為應為 2 萬人左右，參見湯熙勇，〈恢復國籍的爭議：戰後旅外臺灣人的復籍問題（1945-1947）〉，《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7: 2（2005 年 6 月），頁 401。種種統計數字的差距，可能是因為計算範圍的不同，例如軍人軍屬是否計入。筆者較贊同簡筌簧的看法，因為根據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於 1946 年底在省參議會報告，迄該年 11 月 20 日止由日返臺臺胞就有 22,571 人，12 月 20 日又宣稱尚待回臺之旅日臺胞尚有 25,200 餘人，亦即已回臺及準備回臺者已接近 5 萬人。參見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印，《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頁 23。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卷首下大事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68），頁 330。

(10) 簡筌簧，〈光復後政府接運旅日臺胞返籍之探討〉，頁 1177。

(11) 楊國光，《一個臺灣人的軌跡》（臺北：人間出版社，2001），頁 147-148。

然東京臺灣同鄉會會長的產生過程顯然有爭議，以致出現種種不同說法。朱昭陽在回憶錄中說，東京臺灣同鄉會初採委員制，由朱昭陽、謝國城、陳文彬等七人為常務委員，常務委員會並推朱昭陽為議長、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五日，林獻堂接獲擔任東京臺灣同鄉會會長的女婿高天成來自東京電報指稱，「在日京解甲臺僑不下數千，歸計未就，旅囊羞澀，而氣候日增寒冷，物價逐日飛漲，饑寒交迫，情形極為嚴重，籲請救援。」<sup>(12)</sup> 林獻堂乃號召組成臺灣省海外僑胞救援會，著手海外臺人歸臺與捐款救濟事宜。二十三日林獻堂偕羅萬俔、黃朝清、陳炘、林雲龍拜訪前進指揮所主任葛敬恩，請求交涉運載船隻；<sup>(13)</sup> 又託外交部駐臺灣特派員黃朝琴向外交部轉致陳情書，請國民政府代向駐日之盟軍總部洽准匯寄捐款救濟臺胞，並核撥專輪或載運日僑之船隻順道運回滯日臺人。<sup>(14)</sup> 二十四日，又有黃宗岳等人向葛敬恩陳情，請求接運被日本海軍徵往神奈川縣等處為航空廠工員的臺灣學童 8,419 人。<sup>(15)</sup> 十二月四日，東京臺灣同鄉會電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聲稱有為數約 7 萬名的臺灣人準備返鄉，請求陳儀長官與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洽商辦法，急速救助。<sup>(16)</sup>

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國民政府行政院訓令外交部，電知盟軍總部，表示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已準備接受在日本之臺人返臺，<sup>(17)</sup> 終於開始臺灣人遣送返鄉的作業。同年十二月五日，留日臺人開始返鄉之路，首批六百餘人於十二月二十三日抵臺。<sup>(18)</sup>

---

謝國城為副議長；之後同鄉會改組為會長制，由晚些回臺的高天成為會長。參見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 70。但同鄉會成員之一的廖史豪則指出，東京臺灣同鄉會中陳文彬與朱昭陽競選會長，朱昭陽當選，但因有人批評朱氏曾當日本官、做日本人池田養子，豈能擔任會長，所以朱氏將此職位讓給高天成。參見〈廖史豪口述訪問紀錄〉，收於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採訪記錄，《臺灣獨立的先聲：臺灣共和國》（臺北：吳三連基金會，2000），頁 23。另有一說則指陳文彬先被推舉為會長，但他以回臺灣為由推辭，才改由高天成、高玉樹分任正副會長。參見楊國光，《一個臺灣人的軌跡》，頁 147。而當時是小留學生的高俊明則在回憶錄中說，經過選舉，高天成最高票當選會長，但一些想當會長、委員的人當場大聲批評、攻擊，爭權奪利，情況混亂。參見高俊明、高李麗珍口述，胡慧玲撰文，《十字架之路》，頁 94-96。種種說法雖然不同，但都一致指出高天成是當時東京臺灣鄉會的會長。

(12)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5 年 10 月 15 日。郭海鳴，《臺灣省通志稿·卷十·光復志》（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2），頁 44-45。

(13)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5 年 10 月 23 日。

(14)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5 年 10 月 30 日。檔案管理局，〈據臺灣省海外僑胞救援會代表林獻堂等呈請轉給駐日聯軍統帥准予匯寄捐款並核撥專輪運送臺胞事〉，流水號 0000339311。

(15) 〈黃宗岳等建議接運日本徵用之本省學童返國〉，收於何鳳嬌編，《政府接收臺灣史料彙編（下冊）》（臺北：國史館，1993），頁 945-947。

(16) 〈東京丸之內臺灣同鄉會請速運返臺胞〉，收於何鳳嬌編，《政府接收臺灣史料彙編（下冊）》，頁 944-945。

(17) 檔案管理局，〈關於在日本及朝鮮之臺灣人返臺灣案〉，流水號 0000339311。

(18) 郭海鳴，《臺灣省通志稿·卷十·光復志》，頁 46。

## (二) 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

戰爭期間，在日本的臺灣學生不太敢聯絡或聚集一堂，避免被特高注意，但此刻已無顧慮，臺灣人之間也出現各種橫向聯絡團體，定期聚會。<sup>(19)</sup> 例如一九四五年十月約兩千名臺灣留學生組成了臺灣學生聯盟，<sup>(20)</sup> 曾任教於上海復旦大學的陳文彬組織了光復會，廖史豪、蔡子民等東京《中華日報》人員組織了鵬南會，<sup>(21)</sup> 以朱昭陽為中心的臺灣留學生則組織了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

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在一九四六年初召開了成立大會。臺灣菁英們不知何處找來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懸掛牆上，卻因對祖國的不熟悉，把橫式國旗給直掛了。<sup>(22)</sup> (圖一) 成立大會中推舉朱昭陽為會長、謝國城為副會長、宋進英為總務課長、林迺敏為財務課長、楊廷謙為組織課長、郭德焜為調查課長、曹欽源為文化課長等。<sup>(23)</sup> 該會成員近兩百人，大多數為知識份子，也有部分是戰爭中被日本政府徵用的勞工。成員之一的賴永祥認為該會是以東京帝大為中心所組成，幹部也以東京帝大人為主。<sup>(24)</sup>

依據《朱昭陽回憶錄》中所收錄的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成員合照及相關史料，筆者將研究會主要成員名單與背景整理如表一。

## (三) 祖國想像

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的母體，可以追溯到戰爭末期成形的「烏秋寮」。中央大學法科畢業的楊廷謙，擔任東京都廳總務課囑託之職，主要負責管理東京都地產業務。戰爭末期由於美軍轟炸，楊廷謙所居住的公寓被燒燬，於是在其所管理的位於東京目黑區、於空襲中炸燬的伊達公爵宅邸廢墟上，搭建房屋。當時還有郭

(19)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青春·臺灣 我的青春·香港》，頁 61-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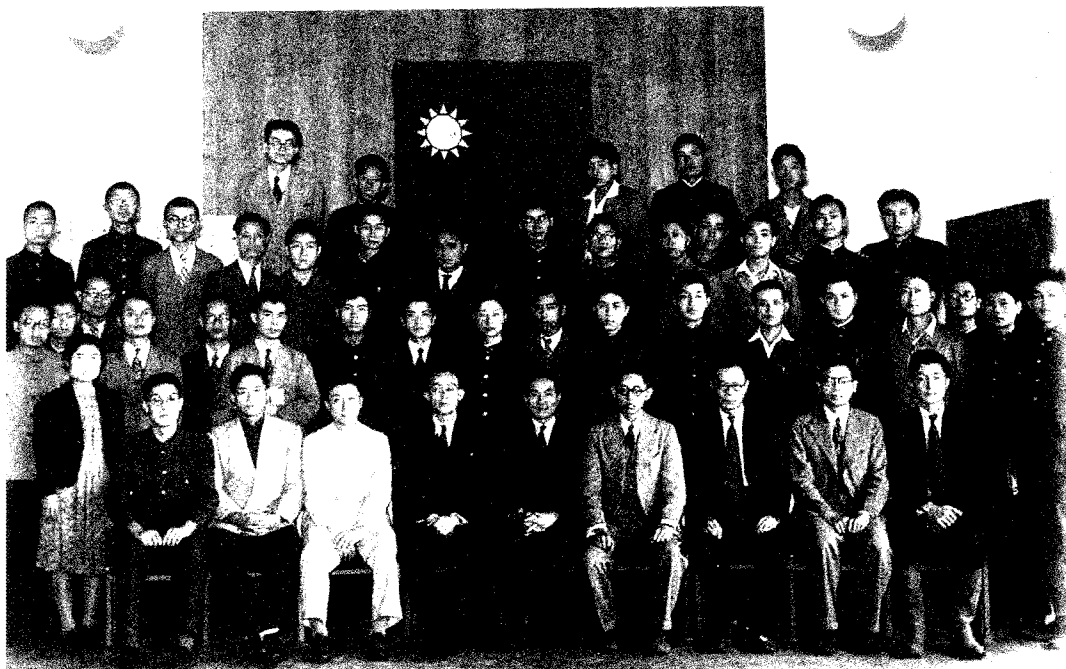
(20) 楊國光，《一個臺灣人的軌跡》，頁 149。

(21) 〈廖史豪口述訪問紀錄〉，收於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採訪記錄，《臺灣獨立的先聲》，頁 24。

(22) 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主要成員合照，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 9。

(23) 同上註，頁 68-69。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的成立時間另有一說，當時還是東京帝大醫學系學生葉盛吉在日記中記載，他參加了 1945 年 10 月 10 日成立的該研究會，參見楊威理著、陳映真譯，《雙鄉記》（臺北：人間出版社，1995），頁 185。如對照朱昭陽等人的說法，研究會的聚會活動在 1945 年 10 月就已展開，成立大會則稍遲至 1946 年初才舉行。

(24) 許雪姬、張隆志等訪問，鄭麗榕、吳美慧等記錄，〈賴永祥先生口述訪問紀錄〉（未刊稿）。



圖一 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主要成員合照

說明：此照是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成員約於一九四五年底之合照，臺灣知識菁英不識「祖國」，竟然把作為背景的國旗給直掛了。

照片中第一排坐者，右一林宗義，右三林迺敏，右四宋進英，右五會長朱昭陽，右六副會長謝國城，右七盧敬亭，右八楊廷謙，右九鍾啟安。

第二排站立者，右一陳瑞五，右二楊建基，右四童搖轍，右五潘作宏，右六李中志，右七林宗人，右九郭德焜，右十許書刀。

第三排站立者，右六陳成慶，右八江萬煊，右九曾浴沂，右十三賴永祥。

最後排站立者，右二楊建業，右三楊廷椅，右五蘇銀河。

資料來源：宋文彬先生提供。

德焜、童搖轍、童的同學陳仁傑等人，都搬到這裡住在一起。因為空襲，無處可居的親戚朋友，或收留的人，共同生活者有十多人，<sup>(25)</sup> 成為戰爭末期臺灣同鄉遮風避雨的共同住所。

楊廷謙將這個地方取名叫「烏秋寮」。據當時也住在此處的楊廷謙之侄楊建基指出，楊廷謙特別喜歡烏秋這種鳥類，他認為烏秋代表認真工作的勞動階級，常

(25) 陳翠蓮訪問記錄、楊建基先生口述，2006年5月30日。

表一 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主要成員一覽表

姓名	生卒年	學歷	戰前經歷與研究會職務	戰後初期工作	二二八事件後動向
朱昭陽	1903-2002	東京帝大經濟學部	大藏省專賣局高崎支局長 研究會會長	大同中學校長	延平中學校長 董事長
謝國城	1912-1980	早稻田大學政經系畢	讀賣新聞政經記者 研究會副會長	大公企業總經理	立法委員 臺灣省合作金庫副總經理
林迺敏	1917-1978	東京帝大政治學部	日本高等外交官考試及格 別府市郵政局長 研究會財務課長	臺灣大學副教授	新生蕨袋廠總經理、新臺灣基礎公司
宋進英	1908-1979	東京帝大法律學部	東京執業律師 研究會總務課長	籌辦延平學院	延平中學副校長
楊廷謙	1917-1990	中央大學經濟學部	埼玉縣法院推事 東京都廳總務課囑託 研究會組織課長	大同中學教務主任	因政治案件受刑六年
郭德焜		東京帝大經濟學部	研究會調查課長	臺灣拓殖會社	逃亡 臺北企銀總經理
曹欽源		東京帝大文學部中文學系	研究會文化課長	臺大中文系教授	臺大中文系教授
林宗義	1920-	東京帝大醫學部		臺大醫學院教授	世界衛生組織專家顧問
李中志 (李金財)	1916-1950	中央大學法律學部	陸軍少尉		因政治案件被槍決
許書刀		東京帝大醫學部		省衛生處疫苗研究所	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所長
陳成慶	1921-	東京工業大學		開南商工教師	臺大化工系教授
江萬煊	1922-	東京帝大醫學部		臺大醫學院教授	臺北醫學院院長



賴永祥	1922-	東京帝大 法學部	陸軍少尉	臺灣拓殖會 社	臺大圖館系主任、 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副 館長
蘇銀河	1921- 1985	京都帝大 醫學博士		省立澎湖醫 院外科主任	省立澎湖醫院 院長
李燧煤		東京帝大 法學部	高等考試行政科及格 貴族院事務官		
魏火曜	1908- 1998	東京帝大 醫學博士		臺大醫學院 教授	臺大醫學院院 長
高天成	1904- 1964	東京帝大醫 學博士	東京帝大醫學部研究	臺大醫學院 教授	臺大醫院院長
葉盛吉	1923- 1950	東京帝大醫 學部 臺大醫學院	東京帝大學生	臺大醫學院 學生	因政治案件被 槍決
張冬芳	1917- 1968	東京帝大 文學部		延平學院教 師	因政治案件逃 亡
王育霖	1919- 1947	東京帝大 法學部	京都地檢處檢察官	新竹地院檢 察官	因二二八事件 身亡
吳振坤		京都帝大 宗教哲學科		牧師	臺南神學院教 授
王金茂	1913- 2003	慶應義塾大 學醫學院		民政處衛生 局職員	行政院衛生署 署長
張漢裕	1913- 2000	東京帝大 經濟學部		臺大經濟系 教授	臺大經濟系教 授
邱永漢	1924-	東京帝大 經濟學部			逃亡 企業家
鍾啓安		神學院			牧師 YMCA 創辦 人
童搖轍	?-2005	化學專業	東京市政府試驗所		商業 臺灣省儀器公 會理事長
林宗人	1923- ?	明治學院 文科			彰化銀行經理

楊廷椅	1924- 1950	明治學院			因政治案件被 槍決
林秀棟	1923- ?	東京物理學 校		臺中農專	因政治案件判 刑十年
楊建業	1923- 1963	宇都宮農專		水利局職員	嘉南大圳管理 委員會總工程 師
楊建基	1925-	秋田鑛山專 門學校		臺灣石炭調 整委員會職 員	煤礦調整委員 會科長
盧敬亭		東京帝大			返回廈門
陳瑞五					自來水公司
潘作宏	1925-	東海大學 電氣工學科		高雄工業學 校教師	
曾浴沂	1922- ?	東京農業大 學		臺中農專講 師	農業試驗所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本表名單部分主要參考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9。表中之學經歷等欄乃作者綜合各種相關資料後整理而成，因出處甚多，無法一一列出。本表並經賴永祥、楊建基二位先生及許雪姬教授提供資訊，惟陳瑞五基本資料仍無法完整。

常站在牛背上抓蟲子，有著忠心與友善的性格，又敢於對抗兇猛的老鷹，具有勇敢與義氣的精神。因為喜歡這種具有濃濃臺灣特質的鳥類，所以將住所以為秋名之。(26)

楊廷謙曾擔任中央大學橄欖球隊教練，熱心於這項運動，具有魄力、包容與領導能力，很得朋友們的信賴。他的烏秋寮可分為兩個時期，戰爭中共同規律生活的時期，約有十多人；第二個時期是戰爭結束後，戰時被徵召的學徒兵們都回來了，成員愈為增加，固定在此居住者約二十餘人，楊廷謙及其妻簡淑循、弟弟楊廷椅，子侄輩楊建業、楊建基，友人林宗義、郭德焜等都聚居於此，來來去去的臺灣同鄉，更是不計其數。(27) 大家共推楊廷謙為「寮公」、童搖轍為「寮母」，

(26) 陳翠蓮訪問記錄、楊建基先生口述，2006年5月30日。

(27) 同上註。童搖轍則明確指出，戰後同住於烏秋寮者有27人，參見謝聰敏，〈留日學生的祖國經驗〉，《自立晚報》，1991年8月1日。

並以黃得時在一九二四年所寫的歌曲「美麗島」為「寮歌」，思鄉之情盎然：

你看咧，一二三，  
水牛吃草過田岸，  
烏秋娘仔來作伴，  
肩甲頂，騎咧看高山，  
美麗島，美麗島，  
咱的臺灣！<sup>(28)</sup>

前述朱昭陽、謝國城等人號召組織臺灣人團體，因為烏秋寮是臺灣同鄉之固定聚所，乃以其成員為主體，擴大組成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sup>(29)</sup>而無論在烏秋寮或研究會，成員們都迫不及待要擁抱祖國。例如在烏秋寮，楊廷謙請來東京帝大留學的廈門人盧敬亭教授「國語」（北京話）；<sup>(30)</sup>聚會中他們看謝春木的《臺灣人の要求》、《臺灣人は斯く觀る》之外，也閱讀孫文的《三民主義》、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新生活運動》等書籍，並且喜愛中國的「義勇軍進行曲」。<sup>(31)</sup>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則借用明治學院為活動地點，每週六、日集會，召開座談會、講座，介紹並討論戰後中日臺情勢；同時因為臺灣人必須重新學習國語，乃商請東京帝大中文系畢業的曹欽源教授北京話，每次都有三、四十人前來，學習興致高昂。<sup>(32)</sup>此外，研究會也依據會員專長分成小組，安排組員進行專題報告。<sup>(33)</sup>

研究會成員們聚在一起各談抱負，期待回到臺灣後能在財經、金融、官界、學界有所發揮，對未來抱著極大的夢想。<sup>(34)</sup>熱切構思建設鄉土的同時，成員們也熱烈地擁抱祖國，對於有關祖國的一切，來者不拒。無論戰爭結束前這些臺灣青

(28) 楊建基先生接受口述訪問時，仍能對此歌曲朗朗上口。這首歌曲應是當時流行的臺灣民謠，高俊明回憶錄中指出，在返臺搭乘的大久丸上，舞蹈家蔡瑞月也教同船年輕人合唱此曲為所編舞蹈配樂。參見高俊明、高李麗珍口述，胡慧玲撰文，《十字架之路》，頁100。

(29) 陳翠蓮訪問記錄、賴永祥先生口述，2006年5月26日。陳翠蓮訪問記錄、楊建基先生口述，2006年5月30日。

(30) 陳翠蓮訪問記錄、楊建基先生口述，2006年5月30日。

(31) 謝聰敏，〈留日學生的祖國經驗〉，《自立晚報》，1991年8月1日。

(32) 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68-69。

(33) 陳翠蓮訪問記錄、楊建基先生口述，2006年5月30日。陳里攀，〈跟隨同行六十年〉，收於財團法人延平昭陽文教基金會編，《螢光曲》（臺北：延平昭陽文教基金會，2003），頁241。

(34)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青春·臺灣 我的青春·香港》，頁62。

英如何看待自己的國籍，有著怎樣的國家認同，此刻，對於即將前來統治的祖國，他們確實是醞釀著濃郁的情感的，例如曾經一度是激烈右翼皇國青年的葉盛吉，在他的日記中是這樣描寫的：

明治學院的我們的會的特色是研究的、暖和的。一同唱「漁光曲」，依唱我們的唱歌，以親我們的祖國文化。(35)

從烏秋寮的聚會到研究會的活動，成員們充滿鄉土熱情，並且對於祖國深信不疑。雖然一切都還在重新認識與學習，但在他們的想法中，建設臺灣與擁抱祖國幾乎是同一回事。

如何建設新臺灣？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成員們經過討論後，逐漸有了共識。他們認為日本治臺五十年，刻意限制臺灣的教育與人才培養，今後要建設臺灣，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教育是培養人才的首要急務，<sup>(36)</sup> 因此以日本著名的兩所私立大學早稻田大學與慶應義塾大學為參考目標，打算將來募款籌辦私立大學。<sup>(37)</sup>

依據國民政府行政院所公布的「在外臺僑處理辦法」，臺僑自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起即恢復中華民國國籍，由外交部分電各駐外使館，請各駐在國政府查照。在外臺僑須由駐外領使館辦理登記，確定其臺灣籍貫，恢復中華民國國籍。對於聲明不願恢復中國國籍之臺僑，駐外領使館應予許可，彙報內政部備案，並通知該居住國政府。<sup>(38)</sup> 也就是說，在當時情況下，在日本臺灣人可以主動聲明不恢復中華民國國籍，保留日本國籍。<sup>(39)</sup> 但多數臺灣人不願申請入籍成為日本人，而是相約返鄉，帶著興奮與憧憬，彼此鼓勵一同返鄉建設新臺灣。<sup>(40)</sup>

因為編織了返鄉辦學的梦想，研究會的菁英們決定放棄在日本的一切。朱昭

(35) 葉盛吉 1945 年 11 月 25 日的日記，轉引自楊威理著、陳映真譯，《雙鄉記》，頁 185。

剛開始學習中文的葉盛吉，以不太通順的中文寫下這段日記。「漁光曲」是一著名中國電影的主題曲。

(36) 陳翠蓮訪問記錄，宋文彬先生口述，2005 年 11 月 14 日。宋文彬，〈先父宋進英二三事——在東京及創辦延平前後時期〉（1998；未刊稿）。

(37) 許雪姬、張隆志等訪問，鄭麗榕、吳美慧等記錄，〈賴永祥先生口述訪問紀錄〉。

(38) 李汝和，《臺灣省通誌卷十光復志國籍恢復篇》，頁 56。

(39) 這是中華民國政府的規定，但包括美、英、荷等國都對此種片面規定持保留態度，認為在和平條約簽定前，臺灣主權尚未正式轉移，並不承認臺灣人恢復為中華民國國籍。參見湯熙勇，〈恢復國籍的爭議〉，頁 393-437。

(40) 汪其楨，〈大久丸上同船君子〉，《聯合報》，民國 93 年 8 月 4 日。

陽放棄多年文官資歷、辭去大藏省的職位，一九四六年二月，在橫須賀港搭乘冰川號，與魏火曜等六、七百人回到臺灣。<sup>(41)</sup>載著大小臺灣留學生兩千多人的大久丸，在航程中，楊廷謙等人安排舉辦了同歡晚會，船上青年合唱蔡培火所作的歌曲「咱臺灣」，為舞蹈家蔡瑞月伴舞。<sup>(42)</sup>原本在東京擔任律師工作的宋進英，已從遣返的日本友人口中得知國民政府接收的亂象，雖然弟弟選擇長留日本、友人也力勸他不要返臺，但仍然沒有改變他奉獻故鄉的決心，一九四六年六月在吳港搭上美籍自由輪返臺。<sup>(43)</sup>

據長官公署的統計，至一九四六年五月，自日本返臺者 19,725 人。<sup>(44)</sup>同年十一月底，自日本返鄉者已達 22,571 人。<sup>(45)</sup>

### 三、黑暗中的螢光

憧憬著新時代來臨，可以一展抱負的臺灣菁英們，分批回鄉後發現，現實情況並不如原本所想像。因為工作機會難尋，維持溫飽成為第一要務，大家各自忙著找工作，研究會也因此沒有展開任何活動。<sup>(46)</sup>

由於行政長官陳儀的偏見，臺灣人在文官體系不受重用。<sup>(47)</sup>據楊基銓所言，戰後初期無論是舊總督府時期或自日本本土返臺的臺灣人高等文官，都沒有被拔擢擔當重任。<sup>(48)</sup>例如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成員中，有著日本大藏省專賣局主管經歷的朱昭陽，並未被借重專長，而是透過國語學校前輩、臺北市長游彌堅任命，

(41) 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 73-76。

(42) 汪其楨，《舞者阿月》（臺北：遠流出版社，2004），頁 43-52。汪其楨，〈大久丸上同船君子〉，《聯合報》，民國 93 年 8 月 4 日。

(43) 陳翠蓮訪問記錄、宋文彬先生口述，2005 年 11 月 14 日。宋文彬，〈先父宋進英二三事〉。

(44) 〈民政處工作報告〉，收於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編，《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1946），頁 54-55。

(45) 〈民政處工作報告〉，收於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頁 23。

(46) 熊秉真等訪問，江東亮、鄭麗榕記錄，《魏火曜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頁 18-19。賴永祥、楊建基、朱昭陽等人也都指出，研究會在返臺後並未展開活動。

(47) 關於陳儀的用人政策，可參考湯照勇，〈臺灣光復初期的公教人員任用方法〉，《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4: 1（1991 年 11 月），頁 391-425。

(48) 楊基銓，《楊基銓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1996），頁 176。

接收日本人在大龍峒所辦的私立學校，改為臺北市立大同中學，擔任第一任校長。<sup>(49)</sup>東京帝大畢業的賴永祥、朱華陽、郭德焜與周叔輝四人，也賴陳逢源的介紹，到臺灣拓殖株式會社工作。<sup>(50)</sup>而邱永漢、楊廷謙則被安排到財政處，在當過幾個月的閒差之後，相繼辭職。<sup>(51)</sup>

從筆者所整理的表一中可以看到，同樣畢業自名校的臺灣菁英，絕大多數法政背景出身的研究會成員都沒有機會在政府機關任職，但醫學、農業專長的成員，則有多位在臺大醫學院任教，或到衛生機關等相關單位工作。這種輕法政、重專技的傾向，與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有著微妙的雷同之處。對於臺灣菁英而言，回歸祖國懷抱意味著不必再受差別待遇，但祖國的對待，澆了他們一大盆冷水。

在尋求公職未如理想之後，朱昭陽觀察到，大陸來的接收官員「對於教育不像對權力與錢財那樣緊緊控制」，研究會成員如魏火曜、高天成、陳茂源、曹欽源、林宗義、陳成慶等，先後都到臺大擔任教授，<sup>(52)</sup>楊基銓也指出戰後臺灣人菁英在政界少有出路，多轉往教育界發展。<sup>(53)</sup>因此朱昭陽認為，辦學校可能會是日本歸臺菁英較好的出路，更加強了辦學的決心，積極策劃創校事宜。

### (一)籌設延平學院

依據朱昭陽等人的想法，日本殖民地教育政策下，臺灣人之教育不受重視；到了日本統治後期雖有中學、高校、大學之設，但名額有限，極少青年有機會讀大學；而且日治時期國語學校、師範學校畢業者，都無投考大學之資格，戰後之初有意再入大學深造者比比皆是，大學之設立有迫切的需要。<sup>(54)</sup>

創立學校需要師資、經費與校舍。在人力與師資方面不成問題，因為返臺前所組織的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裡人才濟濟，甚至有多人在臺灣大學任教。<sup>(55)</sup>而研究會的成員也有多位自始即協助學校的創設，例如東京帝大法科畢業、具有律師

(49) 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 78-79。

(50) 許雪姬、張隆志等訪問，鄭麗榕、吳美慧等記錄，〈賴永祥先生口述訪問紀錄〉。

(51)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青春·臺灣 我的青春·香港》，頁 76。

(52) 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 84。

(53) 楊基銓，《楊基銓回憶錄》，頁 176。

(54) 私立延平中學輯，《朱昭陽先生言論集：螢之光》（臺北：私立延平中學，1990），頁 88。

(55) 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 86。

資格的宋進英，返臺後並未重新執業，即全力投入延平學院的籌設工作，<sup>(56)</sup>一九四六年八月底，也是東大畢業的賴永祥辭掉了臺灣拓殖會社的工作，與朱華陽、郭德焜三人都正式加入延平的團隊，成為專職人員。<sup>(57)</sup>

其次是籌措經費，離臺已久的朱昭陽需要得力人士協助，經人介紹，認識了劉明。因煤礦發跡的劉明頗為熱心協助募款，例如在一九四六年五月，劉明即趁著省參議員林獻堂來臺北開會之際，向他募款，林氏允諾捐助 3 萬元。<sup>(58)</sup> 他並帶著朱昭陽跑遍臺灣各地，到瑞芳拜訪李建興、到基隆拜訪顏欽賢、到中南部拜訪當地士紳，說明辦學宗旨。許多士紳們都答應贊助支援，何義率先捐獻 30 萬現金，做為學校開辦的基金。<sup>(59)</sup>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日，延平大學籌備會於一日下午假省參議會食堂舉行成立式，計有省參議員及籌備委員共五十餘人出席，先由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說明設立宗旨及籌備經過、朱昭陽報告設立案後，全場並推舉林獻堂為籌備會主任委員，省參議員及陳逢源、劉明、陳逸松為各縣市之常任籌備委員。會中並決議一、初期計劃成立法、商、工三個學院，每一學院學生數每學年 200 名，四學年制，每學院學生 800 名。二、校舍地址在峴川町舊家政女學校之校舍。三、預定籌募基金 2,000 萬元。<sup>(60)</sup>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日下午三時，延平大學籌備會邀請臺灣文化協進會與臺灣省教育會人士，在中山堂舉行談話會，與會者有游彌堅、吳克剛、陳兼善、林呈祿、周延壽、劉克明、黃純青、黃啓瑞、蘇惟梁、許乃昌。會中決定學校名稱暫定為延平學院，先成立法學院，自本年九月起招生，其他學院再繼續推動，而後完成為一綜合性大學；校舍方面擬請教育處撥用前第三高女校舍；此外並決定聘請全省各地人士若干名為該校董事，以期負責推進諸事宜。<sup>(61)</sup>

七月二十三日，朱昭陽、劉明與陳春印到霧峰拜訪林獻堂，邀請他出任延平

(56) 陳翠蓮訪問記錄、宋文彬先生口述，2005 年 11 月 14 日。宋文彬，〈先父宋進英二三事〉。

(57) 許雪姬、張隆志等訪問，鄭麗榕、吳美慧等記錄，〈賴永祥先生口述訪問紀錄〉。

(58)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6 年 5 月 13 日。

(59) 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 85。朱昭陽指出，諸多士紳都答應捐款，但承諾的款項還沒去收，學校就因二二八事件被關，惟一收到的是何義的捐款。

(60) 《人民導報》，民國 35 年 5 月 2 日。

(61) 《民報》，民國 35 年 7 月 21 日。

學院之董事長，林獻堂因為正與臺中地區人士討論成立基督教大學及醫科大學之事，一度還曾有三校合一之議。<sup>(62)</sup> 林獻堂欣然接受出任董事長，「並為紀念延平郡王鄭成功不畏強權、不貪名利、誓死反抗滿清、反對外來支配之民族精神」，乃將學校命名為「延平」；但因尚不足三個學院，暫無法成立大學，故名為「延平學院」。<sup>(63)</sup>

再者，籌辦學校馬上需面臨的即是校舍問題。由於興建校舍不只需要大筆資金，並且緩不濟急，如果想要從速開學，只有借用他校的教室，在夜間上課。朱昭陽並坦言，最重要的考慮是，夜間上課才能夠提供日本殖民政策下失去上大學機會的就業民眾上進的機會，因此決定先辦夜間部。<sup>(64)</sup> 日治時期的臺北商工學校戰後改為私立開南商工學校，但因校舍破舊荒廢，仍在停課中；朱昭陽與劉明乃找開南商工負責人臺北市參議會議長周延壽商量復校事宜，由朱、劉負責校舍之修繕，延請開南商工學校校友王民寧任董事長、陳有諒任校長；協議在開南校舍修復之後，夜間借給延平學院使用。<sup>(65)</sup>

八月七日於基隆市政府會議廳召開延平學院基隆市籌備委員會，會中發言熱烈，並成立募款委員會，推舉委員多人，決定分三期為延平學院捐集 150 萬元捐款。<sup>(66)</sup> 朱昭陽與劉明並巡回各地，十五日於臺南、二十六日於高雄、二十七日於屏東、二十八日於嘉義等各市舉辦創立籌備座談會，懇請各界熱心教育人士群策群力，共同參與。<sup>(67)</sup>

依照國民政府規定，大學或獨立院校之設立，必須經過教育部核准。但教育部遠在南京，要先到南京申請許可後再開學，有實際上的困難。朱昭陽於是就此問題請教對中國政情較為熟悉的董事游彌堅，游氏授以中國大陸常有的作法，即先設立學校，招生開學後，再補辦手續。<sup>(68)</sup>

一九四六年八月下旬，延平學院在各報刊登招生啓事，將招收本科生 100 名，

(62)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6年7月3日，24日。

(63) 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86-87。

(64) 同上註，頁85。

(65) 同上註，頁86。

(66) 《民報》，民國35年8月9日。《臺灣新生報》，民國35年8月9日。

(67) 《民報》，民國35年8月24日。

(68) 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88。



包括法律 50 名、經濟 50 名、補習科 3 名，總共預備招收學生 400 名。<sup>(69)</sup> 補習科的設置，主要是因為過去日本中學學制只有五年，而依照中國學制，要有六年中學的資格才可以進入大學，所以五年制畢業的中學生，需要進入補習科讀一年，又如只讀四年、或是從四年制的女子中學畢業的人，需要進入補習科讀兩年，才可以進入大學，所以規劃設置補習甲班（一年）、補習乙班（二年）。而若是五年制中學畢業的人，若能配合其他相關資格，也可以進入本科一年級。<sup>(70)</sup>

## (二)官方的質疑

根據現今延平中學所保存的〈私立延平大學設立計劃書〉中所載，延平大學設立旨趣如下：

……臺灣光復以來，已過半載，而經濟的恢復、文化的向上，牛步遲遲，混沌低迷，其原因何在，實因人才缺乏，各界若能配置多量的人材，則經濟的再建、文化的向上，可指日而待。我們臺灣，人材的缺乏，沒有今日這樣嚴重。臺灣的盛衰，實靠人材的培養和教育的充實，光復以後，各處高級中學，增加得多，而大學僅一個，所收的學生數也很僅少，大學的設立，是真必要的。現在民生嚴重，教育的振興，像有迂遠之感，實乃緊要問題中的最緊要的。因此，我們提倡設立一個大學，以培養純真而至誠的青年，做人民的先鋒，來建設我們新生臺灣。<sup>(71)</sup>

從文脈來判斷，此計劃書大約是一九四六年四到五月間所做，成立旨趣中尚且念念不忘要建設「新生臺灣」，透露出延平大學的籌設確實與在日本所成立之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在精神上可謂一脈相承。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日，《人民導報》刊載，延平大學第一次籌備會於一日下午假省參議會食堂舉行成立式如前文所述，《臺灣新生報》也作了同樣的報導。<sup>(72)</sup>

(69) 《民報》，民國 35 年 8 月 19 日。《臺灣新生報》，民國 35 年 8 月 19 日。

(70) 許雪姬、張隆志等訪問，鄭麗榕、吳美慧等記錄，〈賴永祥先生口述訪問紀錄〉。

(71) 〈私立延平大學設立計劃書〉，收於延平中學創校五十週年紀念專輯編輯委員會編，《延平中學創校五十週年紀念專輯》，頁 34。

(72) 《臺灣新生報》，民國 35 年 5 月 2 日。

奇怪的是，過了兩星期之後，五月十九日《臺灣新生報》再次報導二日延平大學籌備委員會之事，新聞中並指出該校「教授全部網羅全省人材，無分內外大學之出身，就臺灣之範圍內招聘最高權威，不陷於門閥主義、學閥主義之弊害，將組成教授招聘委員會，求多數專家之綜合意見決定之。」<sup>(73)</sup>

依報導看來，延平大學希望打破門閥之見，招聘全臺最優秀的教授，原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但是，幾日後，這個行政長官公署機關報竟以社論批評此事：

……最近本省各界人士，為紀念臺灣光復，擬創設私立延平大學。以地方的金錢培養地方的人材，這原是最有意義之舉。但據報上關於該校的設立計劃概要所載，教授全部要聘用本省人，這便造成了一種印象：即在本省人士意識中，臺灣有什麼可以發揚的獨立文化，或是要建立什麼臺灣本位的文化。因為假如不是這樣，則以一個研究高深學術的教育機關，正宜廣延國內乃至國際的人材，現在卻打算全部用本省人為教授，顯然毫無意義可言。該校籌備人在擬據計劃時或者見不及此；我們這樣說也並不在於批評這計劃的本身。這只是一個例子。我們認為我們應該拋棄任何臺灣本位的意識，避免造成臺灣本位主義的印象。<sup>(74)</sup>

觀諸延平大學設立計劃書與籌備會後各報的報導，都未提及只用臺人為教授的主張。長官公署機關報《臺灣新生報》不知從何而來的消息，作了這樣的報導，並且在報紙社論上嚴厲批判，指之為「臺灣本位主義」，似乎意味著官方一開始就對籌設中的延平大學心存猜疑。

五月三十日的《臺灣新生報》上登載了一篇標題為〈延平大學設立の意義〉的文章，文中說明私立延平大學取名「延平」二字，即在繼承延平郡王鄭成功之素志，「代表中國氣質中最具特徵性的慷慨之氣」，國姓爺的節操氣慨直達萬世，「深入吾人血肉，在全臺灣根深蒂固」。而延平大學之設，有兩個理由：一是痛感於中國文化傳統下的官僚因私害公，希望為國家培養有為人才；二是考慮臺灣特殊的情況，彌補日本殖民時期以來臺灣人沒有機會受高等教育的缺憾。大學的增

(73) 《臺灣新生報》，民國 35 年 5 月 19 日。

(74) 〈隔閡應該消除〉（社論），《臺灣新生報》，民國 35 年 5 月 24 日。

設，對臺灣而言是值得慶賀之事，「絕對不是臺灣人群雄割據主義的表示」。(75) 這篇文章以日文發表，並未署名，從其內容來判斷，筆者認為應該是朱昭陽回應官方批判之作，用以向官方交心並自辯。

事實上，正召開第一次大會的臺灣省參議會之會議中，省參議員們也紛紛指出臺灣只有一所大學，無法容納想要繼續升學的眾多中等學校畢業生，建議設立多個省立大學卻不可得，而私立延平大學的籌設，實在是本省青年的一大福音。(76) 顯示在當時，增設大學確有其社會需求，而長官公署的猜忌態度與社會期望之間，存在若干落差。

八月三日下午三時，延平學院在中山堂召開第一次董事會，學校董事林獻堂、黃朝琴、游彌堅、范壽康、劉明、李季谷、陳兼善、許壽裳、吳克剛、陳逸松、陳逢源、陳啓川、朱昭陽、石錫純、宋進英等 15 人上任，並推舉林獻堂為董事長，黃朝琴、游彌堅、劉明為常務董事，朱昭陽為院長。(77) 延平學院的董事中，外省人就有教育處長范壽康、師範學院院長李季谷、臺灣大學總務長陳兼善、省立編譯館館長許壽裳、長官公署參議吳克剛等五席，加上「半山」臺灣省參議會議長黃朝琴、臺北市長游彌堅二席，佔董事席次近半。筆者認為，經歷了前次《臺灣新生報》的嚴詞批判，延平學院董事席次的安排，納入近半數外省人與官方代表，不無洗刷「臺灣本位主義」指控的意味，也可以說是學校當局向官方妥協輸誠，不得不採取的作法。

延平學院準備先開設夜間大學，其資格與一般大學同等，因為夜間上課使得各政府機關公務員亦可得到就學之機會，據各新聞媒體所稱，「對此點得陳長官非常贊成，並有積極援助之意。」(78)

對於延平學院的籌設，民間熱烈響應，當時的各個新聞媒體也給予高度矚目，

(75) 〈延平大學設立の意義〉，《臺灣新生報》，民國 35 年 5 月 30 日。

(76) 《臺灣新生報》，民國 35 年 5 月 25 日、28 日。

(77) 《民報》，民國 35 年 8 月 5 日。《臺灣新生報》，民國 35 年 8 月 5 日。朱昭陽先生在回憶錄中指延平學院董事主要以日治時期抗日先輩來擔任，有蔡培火、吳三連、楊肇嘉、林柏壽、杜聰明等，又請丘念臺代表外省人為校董；政府官員則有游彌堅、劉啟光、黃朝琴；其他董事還有劉明、謝國城等。參見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 87。但朱昭陽所說的董事名單與新聞報紙所刊載者，有極大出入，明顯是記憶錯誤。朱昭陽所說的，是 1949 年以後延平補校之董事名單。

(78) 《民報》，民國 35 年 8 月 5 日。《臺灣新生報》，民國 35 年 8 月 5 日。

密切加以報導。例如在八月七日基隆市籌備會中，與會者發言熱烈，咸認 150 萬元的募款款項不成問題。基隆市長石延漢並表示延平學院為思想自由、追求真理而設立，故將盡全力協助；他期勉延平作為一個私立大學，與官立大學不同之處在於思想與研究之自由，希望學校於可能範圍內發揮研究自由、思想自由，以建設新中國。(79)

八月下旬，延平學院在各報刊登招生啓事，九月八日延平學院舉行入學考試，原訂招收 400 名學生，竟有兩千餘人報名參加考試。《臺灣新生報》以「鬚の爺さんも必死」做為標題，配上考場照片，報導了入學考試激烈競爭的盛況。考生中有四十歲的國校校長、中年上班族、紅顏美少年、年輕女孩，因為錄取率只有五取一，考生莫不奮力拚命；因為考生過多，除了開南工商外，還增借了東門國民學校為考場。(80) 對照同年八月臺灣大學招生，報名學生人數為 1,100 名，(81) 延平學院因為在夜間上課，提供社會青年進修機會，報考人數高於臺灣大學，可以說明學校受到歡迎的程度。

九月十二日各報紛紛報導因為青年踴躍投考，延平學院十一日在中山堂召開臨時校董會議，決定增加錄取名額為 960 名，九月十五日放榜。(82) 最後正式錄取的學生有 1,010 名（包括女生 30 名），共分為 11 班，本科四班四百餘人，補習甲班四班四百十餘人，補習乙班二班一百六十餘人。學生中最低年齡 18 歲，最高 42 歲，其中又以 27 至 30 歲者居最多數，全院百分之八十的學生日間都有職業。(83)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晚上，延平學院借開南商工的操場舉行開校典禮。在沒有照明設備的操場上，點燃一根蠟燭，微弱的燭光下，朱昭陽上講臺主持典禮，以臺語對臺下的一千多名學生致詞：

在這一片漆黑的會場中，所幸有一支燭光帶給我們些微的明亮；我們學校在此時開辦，正是要給這混亂、昏昧的社會提供一線光明，我們要當

(79) 《民報》，民國 35 年 8 月 9 日。《臺灣新生報》，民國 35 年 8 月 9 日。

(80) 《臺灣新生報》，民國 35 年 9 月 9 日。

(81) 《臺灣新生報》，民國 35 年 8 月 3 日。

(82) 《大明報》，民國 35 年 9 月 12 日。《臺灣新生報》，民國 35 年 9 月 12 日。

(83) 李東輝，〈私立延平學院訪問記〉，《臺灣學生》1（1946 年 12 月），頁 10-13。轉引自延平中學創校五十週年紀念專輯編輯委員會編，《延平中學創校五十週年紀念專輯》，頁 52-53。

荒野暗夜中的螢光……(84)

而延平學院創校時的校徽，正是以螢火蟲做為標幟。(85)

## 四、二二八狂燄

延平學院成立後，院長朱昭陽、教務主任宋進英、總務主任張冬芳，上課時間分早班和晚班，每節九十分鐘，早班由下午四點三十分到八點，晚班由六點三十分到九點四十分。學習科目分為一般科目：國語、國文、英語、歷史、地理、自然科學、理則學、美學、語言學、英語會話。專門科目：經濟原論、經濟史、法律概論、民法總則。(86)

學校的教員中，教國文的有曹欽源、黃得時、陳蔡煉昌、張冬芳；教英文有蘇維熊、林迺敏、高秀雄；教歷史有徐先堯，生物有李淦，倫理學有黃金穗。教經濟學有朱昭陽、朱華陽、張漢裕、邱永漢、郭德焜；教羅馬法與法律哲學的宋進英，民法有蔡章麟、洪遜欣、戴炎輝，語言學有陳文彬，哲學有洪耀勳，數學有許遜榮、徐長生。(87) 林衡道也曾在此兼課，教授三民主義。(88) 除正式課程外，校方每週又安排定例課餘講座一次、特別課餘講座二次，延攬各界專家來校演講。(89) 例如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講「學生深造的第一步」、(90) 臺大教授林茂生講有關哲學的議題、廖文奎講「臺灣往何處去？」等等。(91)

(84) 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 88-89。朱昭陽以螢之光勉勵延平學生，令筆者聯想到一首日治時期流傳甚為普遍的歌曲「螢の光」。不過該曲是別離時所唱的歌，戰後仍然流傳，其曲調即一般學校畢業典禮中所播之驪歌。經請教賴永祥先生，他認為朱先生對延平之期許與該歌曲並無關連。

(85) 私立延平學院復原籌備處，〈私立延平學院復原申請書〉（2001 年 9 月），頁 9。

(86) 許雪姬、張隆志等訪問，鄭麗榕、吳美慧等記錄，〈賴永祥先生口述訪問紀錄〉。

(87) 同上註。曾秋美訪問，張嘉元記錄，〈李雲騰先生訪問紀錄〉，收於私立延平學院復原籌備處，〈私立延平學院復原申請書〉，頁 29-30。

(88) 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記錄，《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頁 18-19。

(89) 《人民導報》，民國 35 年 10 月 28 日。

(90) 《人民導報》，民國 35 年 11 月 08 日。

(91) 曾秋美訪問，張嘉元記錄，〈李雲騰先生訪問紀錄〉，頁 30-31。另有一說指演講者是廖文毅，見周藤章，〈謹祝母校延平五十週年校慶憶當年〉，收於延平中學創校五十週年紀念專輯編輯委員會編，《延平中學創校五十週年紀念專輯》，頁 125-126。

由於臺灣才脫離日本統治不久，多數青年還聽不懂北京話，所以延平學院教師有時會用日語與臺灣話授課。(92)

## (一)擴校的準備

到延平學院就讀的學生，多數是有工作的社會人士，其中有小學校長、長官公署官吏、公司主管、學校教員等等，大家都十分珍惜再度進修的機會，求知慾旺盛、出席踴躍，甚至會有臺大學生來旁聽，教室座位往往不敷使用，晚到的人只好站在走廊上聽課。(93) 戰後在臺大醫學院復學，卻對教學品質不斷下降很是不滿的臺灣新生建設研究會成員葉盛吉，也來到延平學院旁聽社會科學課程。(94) 彰化銀行霧峰出張所主任戴明敦也向董事長林獻堂商量，想要報考延平大學，希望轉任到臺北支店。(95) 又從戰後各種新聞媒體對延平學院的密集報導，顯示該校確實受到臺灣社會各界的歡迎與重視。

一九四六年底，《臺灣新生報》報導：

私立延平學院，自開辦以來，頗引起各界注意及熱烈援助，該校自十月上課迄今，將近三個月，成績甚有可觀，學生多半家貧失學之青年，今得受教育之機會，每夜不辭勞苦，不怕寒風踴躍上課，教授亦不拘薪金之多少，犧牲前來服務。頃聞該院院長朱昭陽氏及常務校董劉明氏，因謀該校規模之擴大，及擬設工商學院起見，特到臺中方面與各界人士交換意見，熱望各界予以特別援助。(96)

自延平學院開學後，院長朱昭陽大約每個月一次定期向董事長林獻堂報告學校運作狀況。(97) 一九四七年元月中旬，新聞媒體又報導了延平學院將舉行插班考

(92) 許雪姬訪問、王美雲記錄，〈張朝綱邦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陳翠蓮訪問記錄、宋文彬先生口述，2005年11月14日。

(93) 張炎憲、曾秋美訪問，賴信真記錄，〈延平學院口述史——簡永昌先生訪問紀錄〉，《臺灣史料研究》26（2005年12月），頁175-176。曾秋美訪問、施妙旻記錄，〈延平學院口述史——林竹堂先生訪問紀錄〉，《臺灣史料研究》26（2005年12月），頁186-188。

(94) 楊威理著、陳映真譯，《雙鄉記》，頁211、213。

(95)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6年10月19日。

(96) 《臺灣新生報》，民國35年12月29日。

(97)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6年12月20日、1947年1月30日。

試的消息。(98)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七日上午，朱昭陽同林獻堂到工商銀行拜訪黃朝琴，並一同會見臺灣省行政長官陳儀，商借第三高女校舍作為延平學院之用。陳儀認為延平只有法律與經濟二科，絕對得不到教育部准許設立大學，宜改為商業專門學院為妥，並表示校舍問題俟再斟酌然後決定。(99) 二十日，長官公署教育處為延平學院立案申請問題舉行了座談會，出席者有教育處主秘梁翼鎬、(100) 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延平學院院長朱昭陽、常董游彌堅、劉明、黃朝琴與董事長林獻堂。會議結論是，延平學院非有校舍，不得受許可，並約定於八月完成校舍。(101)

頗受臺灣社會歡迎的延平學院準備要擴大規模，再設工、商二學院，逐步朝向早先擬定的綜合性大學邁進。但從延平學院林獻堂、朱昭陽等人與官方商議的情形可以觀察出，行政長官陳儀對於延平學院發展成為大學，並不支持，也不積極協助校舍問題；教育處則要求在一定時間內興建校舍，才討論立案許可問題。

一九四七年元月底，學校開始放寒假。賴永祥先生指出，大約是二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臺北市長游彌堅邀請了朱昭陽、宋進英、張冬芳和他一起到過了圓山動物園、大約今天士林一帶，去看了一片土地，如果合意，可以在那裡蓋校舍。沒想到，幾天後卻發生了二二八事件。(102)

## (二) 二二八事件中的延平學院

二二八事件有如星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當時學校已放假，院長朱昭陽因母親過世、返回板橋奔喪，他認為學校師生並無組織性的參加事件。(103) 由於大部分學生都因放寒假回故鄉去，個別參加者可能以住臺北的學生居多。(104)

但事件中確實有延平學院學生參與。

(98) 《臺灣新生報》，民國 36 年 1 月 14 日。

(99)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7 年 2 月 17 日。

(100) 〈灌園先生日記〉中指出席者有「梁主任秘書」，經查長官公署人事室所編《臺灣省各機關職員錄》，教育處主任秘書為李毓田，但有一秘書梁翼鎬，筆者推測出席會議者可能是梁翼鎬。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人事室編，《臺灣省各機關職員錄》（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人事室，1946），頁 19。

(101)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7 年 2 月 20 日。

(102) 許雪姬、張隆志等訪問，鄭麗榕、吳美慧等記錄，〈賴永祥先生口述訪問紀錄〉。

(103) 私立延平中學輯，《朱昭陽先生言論集》，頁 54。

(104) 曾秋美訪問，施妙旻記錄，〈延平學院口述史——林竹堂先生訪問紀錄〉，頁 192。

參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會議的延平學院學生徐世通指出，事件發生之後的三月一日，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要求學生出面維持治安。<sup>(105)</sup>二日上午十時，臺灣大學、延平學院、法商學院、師範學院及各中等學校學生數千人聚集在中山堂，舉行學生大會，要求政治民主、教育自由，並討論組織學生，協助維持治安。<sup>(106)</sup>三日，警備總部所安排的忠義服務隊成立，由許德輝任總隊長、廖德雄為副總隊長。四日下午忠義服務隊在北署<sup>(107)</sup>開會，據學生領袖廖德雄的說法，該服務隊各組副組長由學生代表擔任，包括總務組副組長是延平學院的李日富、治安組副組長是成功中學的游英、糾察組副組長是開南商工的高德貴、廖德雄兼糧食組長。學生隊成員來自開南商工、臺北工業學校、法商學院、成功中學、泰北中學、建國中學等，約 1,600 人，延平學院人不多，只有大約十幾人。<sup>(108)</sup>

根據當時的左翼人士回憶，二二八事件中，在中共地下黨的策劃下，準備組織學生軍，採取武裝行動，其中延平學院的葉紀東被分派了工作。<sup>(109)</sup>陳炳基則指出二月二十八日在延平學院召開學生代表會議，三月四日又在延平學院討論了武裝計劃，但最後武裝行動因為武器與接應沒有著落，計劃遂沒有付諸實行。<sup>(110)</sup>二二八事件中臺北地區學生武裝行動實情至今仍相當隱晦不明，例如葉紀東、陳炳基等人明確指出楊建基在武裝計劃中擔任臺灣大學學生領隊，<sup>(111)</sup>但楊建基本人卻完全否認此事。<sup>(112)</sup>延平學院是否成為學生集會地點之說，筆者也持保留看法，

(105) 陳翠蓮訪問記錄、徐世通先生口述，2001年12月27日。張炎憲等，《臺北南港二二八》（臺北：吳三連基金會，1995），頁301-302。

(106) 林木順，《臺灣二月革命》（臺北：前衛出版社，1990），頁21-22。

(107) 北署，指日治時期北警察署，今臺北市警察局大同分局，位於寧夏路89號。參見黃富三、許雪姬訪問，蔡說麗、朱明發記錄，〈廖德雄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4（1993年2月），頁68。另外，南警察署在今中山堂旁，臺北市刑警大隊隊址，武昌街1段69號。

(108) 陳翠蓮訪問記錄、廖德雄先生口述，2001年11月3日。黃富三、許雪姬訪問，蔡說麗、朱明發記錄，〈廖德雄先生訪問紀錄〉，頁64-68。

(109) 藍博洲，《沉屍·流亡·二二八》（臺北：時報出版社，1991），頁28-30。

(110) 同上註，頁83-88。

(111) 同上註，頁29、86、92。

(112) 陳翠蓮訪問記錄、楊建基先生口述，2006年5月30日。楊建基先生表示，從日本返臺後，他就任職於劉明擔任主任委員的石炭調整委員會，並非臺大學生，也不認識葉紀東、陳炳基等人。二二八事件中他在家中，並未有任何參與，完全不知此種說法從何而來。他並表示，如果他真的參與了二二八事件，並列名左派隊伍中，不可能在白色恐怖時期還能全身而退。九〇年代所出版的《沉屍·流亡·二二八》一書中，葉紀東、陳炳基等人所說的内容極其雷同，可能是互為參照，引述自同一來源。



因為被陳炳基指為參與該兩次會議的葉紀東，其口述回憶中卻完全沒有提到相關訊息。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青年學生出面維持治安，有明顯被動員的跡象。包括臺北事長游彌堅、忠義服務隊總隊長許德輝都要求、催促青年學生儘快出動、組織團體、維持治安。<sup>(113)</sup>延平學院董事劉明也受臺北市警察局長陳松堅之請，動員延平學院與開南商工學生分守各警察派出所。<sup>(114)</sup>劉明則在事件後告訴朱昭陽，指出有八、九十個延平學院學生出來保護派出所維持治安。<sup>(115)</sup>

當局催促與動員學生出面，卻在事後指稱學生參與叛亂，誠為可怪之事，原來其中牽涉到政府當局權謀佈局運用之故。行政院《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指出，軍統利用線民許德輝主導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之忠義服務隊。<sup>(116)</sup>近年出土的史料證實了這項看法。忠義服務隊總隊長許德輝呈毛人鳳的〈臺灣二二八事變反問工作報告書〉中陳述，「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蔣渭川、延平大學校董劉明，因見臺北治安日形恢復，深恐此勢削平於彼叛逆不利，即於所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中唆使臺灣大學及臺北各中等以上校學生，計十五單位 1,200 名，組織學生治安隊」。<sup>(117)</sup>不過國防部保密局（軍統）所做之報告卻指出，「延大校董劉明、國民參政員陳逸松亦因鑑於忠義服務隊已盡力恢復全市秩序，為蔓延亂態，亦發動十五校中等以上全體學生罷課，參與叛亂，與蔣渭川、蔣時欽所組織之學生聯盟及學生治安隊混合滋亂，搶劫倉庫、劫奪武器，無所不為，使與忠義服務隊魚目混珠，以遂其反叛陰謀。」<sup>(118)</sup>二二八事件中學生參與了治安維護的工作，保密局反過來指責延平學院董事劉明等人利用學生作亂，事實上這些學生卻正是許德輝等人所

(113) 蔣渭川，《二二八事變始末記》（臺北：家屬自印，1991），頁 37、57、86。

(114) 謝聰敏先生訪問劉明所得知，見謝聰敏，〈二二八事變研究——二二八事變中的黨政關係〉，收於氏著，《黑道治天下及其他》（臺北：謝聰敏國會辦公室，1993），頁 160。

(115) 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 104。

(116)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賴澤涵等），《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94），頁 63-64。有關警備總部與保密局在事件中策動許德輝組織忠義服務隊、動員青年學生的過程，可參考張炎憲等，《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臺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第四章，頁 309-319。

(117) 許德輝呈毛人鳳，〈臺灣二二八事件反問工作報告書〉，收於侯坤宏、許進發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十六）》（臺北：國史館，2004），頁 205。

(118) 警備總部，〈臺灣二二八事變報告書〉，收於侯坤宏、許進發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十六）》，頁 35。

要求動員，藉以掩護他的流氓部隊之用。

二二八事件後，情治機關製作了〈二二八事變叛逆名冊〉，其中延平學院學生僅有陳榮乾一人被列入名冊，他被指為擔任「學生隊代表」之「逆職」，「罪行」是「煽動暴動、自任延平學院學生代表參加處委會」。<sup>(119)</sup> 根據當時參與中山堂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會議之延平學院學生徐世通所言，他因某人士之提醒，在會中是用「假名」參與。<sup>(120)</sup> 因此，「陳榮乾」是否即為徐世通？或另有其人？是否為真名？都尚難獲得證實。

### (三)警備總部下令關閉學校

三月九日凌晨國民政府援軍進入臺北。控制局面後，軍隊開進延平學院，以發現學校藏有武器與「興華共和國」旗幟為由，下令學校停辦。但是朱昭陽指出，當時學校並無軍訓科目，何來武器？對「興華共和國」旗幟從何而來，也無法理解。他認為這些都是可笑的栽贓式罪名，只是要延平學院停辦的藉口而已。<sup>(121)</sup>

三月二十一日，《臺灣新生報》刊登了一則新聞：

私立延平學院，頃由臺省警備總部予以封閉。該部佈告稱：「延平學院辦理不善，且未奉准立案，『二·二八』事變中並有一部分員生參加叛亂，殊屬不法，應予封閉。」又悉：某部曾在該院查出手榴彈七十餘枚，軍用汽油五大桶。<sup>(122)</sup>

依據新聞報導來看，警備總部封閉延平學院的理由有三：辦理不善、未奉准立案、部分員生參與二二八事件。但如前文所述，延平學院自開辦以來受到社會各界的歡迎，學生熱烈報考，學習情形良好，甚至準備擴充規模，因此第一個理由顯然不成立。其次，二二八事件前，延平學院高層已與教育處有所協議，將在八月前完成校舍，俾符合申請要件，並且在期限截止之前已著手尋覓校地，第二個理由

---

(119) 國防部保密局，1947年4月造報，〈二二八事變叛逆名冊〉，收於侯坤宏、許進發編，《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十六)》，頁99。

(120) 陳翠蓮訪問記錄、徐世通先生口述，2001年12月27日。

(121) 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105。

(122) 《臺灣新生報》，民國36年3月21日。

也過於勉強。那麼，第三個理由，延平學院學生參與二二八事件會是學校被關閉的主要原因嗎？

從近年新出土的情治機關密報中，可以得知特務與線民眼中所觀察到的延平學院學生參與二二八事件情形：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的行動：(一)該校學生開會數次，組織學生隊參加治安服務隊，為詞演講激烈，且都用日語宣講，又散發傳單罵國軍為「豚軍」，但是會後沒有結果而得團結。聽說最後組織一隊，只有三十多名參加而已，此隊為「本科一年 B 組組代表」（姓名不詳待查）為隊長，參加叛徒暴動，其他學生尚沒有積極行動。(二)教員中宋教務主任進英看見學生累次開會，甚抱不平，曾從中勸告學生不要參加政治，但是未能勸阻學生，朱校長亦不能阻止，放任他們煽動演講，學生自治會監督者為宋進英和林迺敏（國立臺灣大學先修班教授兼救濟總署辦事員），學生活動情形宋、林二人均知甚詳。<sup>(123)</sup>（按：標點為筆者所加）

根據此項情報，以延平學院一千多名學生的規模，有三十多人參加治安服務隊，情況似乎並不特別嚴重。密報中也指出宋進英與朱昭陽都曾試圖阻止學生參與事件，但無效果。依此而言，學生參與二二八事件的問題，學校已盡勸阻之責，以此做為關閉學校的理由，未免過於牽強。

何況，前文已指出，情治機關的報告中認為延平學院校董劉明與國民參政員陳逸松主導、動員學生組織治安隊伍，但劉、陳二人在事件後非但未被逮捕、追究，劉明反而還被列入省政府委員推薦名單中。<sup>(124)</sup> 如果依照情治機關的認定，則主導學生參與事件者並未被追究，被動員學生所屬的學校卻必須關閉，似乎也缺乏足夠的說服力。更有甚者，二二八事件中，臺北市各校學生多有參與，卻只有延平學院被關閉，更顯出此事的不尋常。

因此，筆者認為，當局關閉延平學院另有考量，情治人員以下的密報內容，

(123) 檔案管理局，〈報延平學院參加二二八事件活動情形由〉，0036/340.2/5502.3/18/002。括弧內文字為檔案原文。

(124) 〈白崇禧呈蔣主席四月十四日簽呈〉附件，〈大溪檔案——臺灣二二八事件〉，收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頁 246-247。

提供了重要線索：

……查臺北延平學院之設立，尚未經教育部許可立案，現有學生總數一千一百名左右。因資金不夠，兼任教員之津貼極為微少，講課每小時津貼僅一百貳拾元臺幣而已。因此，外省籍教員收入不能維持日費，僅留兩、三名，其他講師皆為本省人，尤以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生佔大多數。校長朱昭陽、教務主任宋進英、訓導主任曹欽源，均係帝大生。即該校校務委員十數名中，除一、二名外，亦為東京帝大出身者，故延平學院有東京帝大閩的稱呼。……學生教員思想之動向：延平學院未得立案，雖經校長等努力向本省教育處請求幫忙，但沒有結果，學生們看此情形甚為灰心，但其中有過激份子發出傳單，鼓勵學生團結，請求立案，否則鼓動風潮，此舉受學校當局勸導始得平靜。該校教員二十餘名中，專任教授僅有四、五名，其他皆為國立臺灣大學或其他學校教授兼任，資格學力雖甚豐富，但是國語國文甚為欠缺，而且大多數不知祖國情形，因此對祖國觀念可稱微薄。該校因係夜學學生中以有職業而來苦學者佔多數，年齡比較高，學歷不能稱好，可以說大多數都是失學者而來集中者，其中小（按：少）數為外省籍學生，可是言語不能通達，出席聽講者更小數。對本省籍學生如無國內良好教師指導，難使他們受得真正祖國精神與文化。<sup>(125)</sup>（按：標點為筆者所加）

這則密報內容透露了兩點重要訊息：第一，情治機關早已密切監視延平學院師生、教學與平日運作情形。儘管學校師長並未在課堂上批評時政，校內也未有不滿政府言論，但部分延平學院學生早已察覺學校受到當局特別關注，線民、職業學生潛伏在課堂上蒐集情資，平日格外謹言慎行。<sup>(126)</sup> 第二，在當局的眼中，延平學院師生的省籍色彩與「祖國意識」令其深感憂慮。密報中對於延平學院師資與學生多數是本省人的現象多所著墨，以該校校長、教員多為東京帝大出身，稱之

(125) 檔案管理局，〈報延平學院參加二二八事件活動情形由〉，0036/340.2/5502.3/18/002。

(126) 張炎憲、曾秋美訪問，賴信真記錄，〈延平學院口述史——簡永昌先生訪問紀錄〉，頁 176。曾秋美訪問，施妙旻記錄，〈延平學院口述史——林竹堂先生訪問紀錄〉，頁 188-189。

為「帝大閥」，並且認為他們國語國文能力低落、祖國觀念薄弱；又因學生與教員中只有少數外省人，擔憂學生無法接觸真正的祖國精神與文化。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國民政府剛接收臺灣不久，教育處趙迺傳在電臺廣播指出臺灣省教育設施之重點在於：闡揚三民主義、培養民族文化、適合國家與本省需要、獎勵學術發展、增加教育機會與推行教育法令，一再強調需強化臺灣省民對祖國的認識與向心。<sup>(127)</sup> 繼任的教育處長范壽康也指出，日本的皇民化教育把臺灣同胞日本化，今後教育方向在使臺灣同胞完全中國化，所以必須從加強國語國文與三民主義思想兩方面著手。<sup>(128)</sup> 一九四五年除夕，行政長官陳儀透過廣播，要求臺灣民眾加強心理建設，發揚民族精神，學習國語國文與三民主義，方能貫徹臺灣接管計劃綱要中關於文化設施，所謂增強民族意識、廓清奴化思想、普及教育機會、提高文化水準。<sup>(129)</sup> 亦即，促進祖國化教育是戰後初期臺灣教育之最主要課題。<sup>(130)</sup>

延平學院籌辦之初，官方即以臺灣本位主義為由，在新聞媒體上大加撻伐。官方認為延平學院以臺灣地域主義自外於祖國，陳儀與教育處官員也對學校立案等行政手續問題袖手旁觀。從情治機關的報告更可以看出，當局對於延平學院教師以留日菁英為主甚覺不妥，更對學校師生濃厚的省籍色彩存有疑慮。在長官公署大力推動國語國文、三民主義的祖國化教育政策下，延平學院的性質被認為與祖國化政策背離、缺乏民族精神，這恐怕才是當局下令關閉的主要原因。

此外，情治機關尚有一則密報指出，「聞有民主同盟份子潛伏於臺北教育處及延平學院及各報社三部門活動」，<sup>(131)</sup> 但只有以上簡短的隻字片語，無法得知當局眼中民主同盟同義字的共黨份子在延平學院活動的情形，尚難據以判斷與學校關閉是否相關。

---

(127) 趙迺傳廣播，〈臺灣教育設施之趨向〉，收於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臺灣省教育概況》（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1947），頁 69-71。

(128) 范壽康廣播，〈今後臺灣教育的方向〉，收於同上註，頁 71-73。

(129) 陳儀廣播，〈民國三十五年度工作要領〉，收於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陳長官治臺言論集第一輯》（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1946），頁 44-46。

(130) 何清欽，《光復初期之臺灣教育》（高雄：復文出版社，1980），頁 231。

(131) 檔案管理局，〈復民盟在臺活動由〉，0036/340.2/5502.3/18/009。

## 五、白色羅網

延平學院被關閉後，傳聞當局將進一步搜捕學校的負責人，在楊廷謙、楊廷椅通風報信之下，院長朱昭陽倉惶躲避。<sup>(132)</sup> 教務主任宋進英也離家躲藏，離去前，還親眼看著長子宋文彬在院子裡挖坑並焚燬數十本可能被入罪的心愛藏書。<sup>(133)</sup> 躲藏近月，等待風聲平息後，朱昭陽等人希望能繼續學校的經營，但由於局勢不定，原來幾位專任老師，都已另謀工作，只剩宋進英與賴永祥等人協助延平復校的工作。<sup>(134)</sup>

一九四七年五月初朱昭陽拜訪在臺中的董事長林獻堂，方得知因林獻堂於會見國防部長白崇禧時，要求讓延平學院繼續運作，學校方能起封。<sup>(135)</sup>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六日，魏道明出任臺灣省政府主席。在留日時期同窗、時任省府主任秘書羅理的推薦下，朱昭陽出任臺灣省合作金庫常務理事的專職工作，延平復校事宜主要由宋進英擔負。<sup>(136)</sup> 爲了籌募經費，宋進英每日騎著腳踏車早出晚歸、摩頂放踵，四處奔波。<sup>(137)</sup> 九月，學校欲修整校舍、請配給水泥，因教育處要求必須由警備司令部取消對學校的查封方能辦理，林獻堂、黃朝琴與朱昭陽等人乃一同拜會警備司令彭孟緝。<sup>(138)</sup> 而學校創立之初，曾以董事長林獻堂的名義申請了一批木材做爲建築校舍之用，於是由賴永祥到太平山林場領取了這批木材，變賣部分，做爲尙無收入時的短暫經費，並利用剩下的木材，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五日成立「臺灣美術工藝社」，開發販售工藝品。<sup>(139)</sup>

---

(132) 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 105。

(133) 陳翠蓮訪問記錄、宋文彬先生口述，2005 年 11 月 14 日。宋文彬，〈先父宋進英二三事〉。

(134) 許雪姬、張隆志等訪問，鄭麗榕、吳美慧等記錄，〈賴永祥先生口述訪問紀錄〉。

(135)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7 年 5 月 4 日。

(136) 許雪姬、張隆志等訪問，鄭麗榕、吳美慧等記錄，〈賴永祥先生口述訪問紀錄〉。

(137) 陳翠蓮訪問記錄、宋文彬先生口述，2005 年 11 月 14 日。宋文彬，〈先父宋進英二三事〉。宋文彬在訪談中不斷描述宋進英日日騎著腳踏車奔波，回到家後顧不得汗水淋漓，灌下一大杯開水，就打開皮包整理帳目的情形。

(138) 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1947 年 9 月 27 日。

(139) 許雪姬、張隆志等訪問，鄭麗榕、吳美慧等記錄，〈賴永祥先生口述訪問紀錄〉。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 155。

原先延平學院商借開南商工校舍於夜間上課，二二八事件後，開南商工董事長、時任臺灣省警務處長的王民寧拒絕再出借教室，幸好西門國校校長陳炳榕鼎力協助，撥借辦公室與夜間上課教室。一九四八年九月，原本的延平學院以補習學校名義開學，招收補校生高中四班，教授高中標準課程；另有商業及法律專修班，修習高中畢業後課程，聘請臺大、師大教授來授課，外界多將之視為延平學院的重新開辦。<sup>(140)</sup> 但因為商業與法律專科畢業生的學歷並未受到官方認可，學生人數愈來愈少，最後終於不得不停招。

### (一)解散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

延平補校剛復校不久，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三日上午，朱昭陽自合庫辦公室被兩名保安司令部情治人員用槍抵住腰部押上吉甫車，同車並到農林廳檢驗局，以同樣手法押走該局副局長、朱昭陽三弟朱華陽。兩人被載到保安司令部保安處的東本願寺地下室牢房。<sup>(141)</sup> 朱昭陽被拘禁近三個月，都未受審問，經承審軍法官楊丕銘告知，當局是要調查戰後在東京所組成之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除朱氏兩兄弟外，包括副會長謝國城、財務課長林迺敏也都被捕入獄。<sup>(142)</sup>

原來，臺灣新生建設研究會成員之一的李中志首先在一九四九年九月被捕，原因是他在日本訂購日本共產黨機關報《紅旗》雜誌，將繳費收據塞進一旗桿中，置於天花板上，但他搬離臨沂街這棟房子時忘了帶走旗桿，後來住進來的新房客是大陸來的外省人，在檢到旗桿與收據後，向保安司令部告發。<sup>(143)</sup> 李中志被捕時，口袋中正好有一封楊廷謙的信件，所以特務人員到楊家搜捕，找到了在東京成立的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會員名冊，於是廣為株連。研究會的重要成員包括會長朱昭陽、副會長謝國城、組織課長楊廷謙、財務課長林迺敏與成員之一的陳成慶都被牽連逮捕。朱華陽雖不是研究會成員，但因為與李中志一起參會，也牽連被

(140) 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 147-150。

(141) 東本願寺，日治時期淨土真宗佛寺，在今日之西寧南路，1949 年成為臺灣省保安司令部保安處，專門拘押、審訊政治犯的黑牢，今已改建為獅子林大樓。陳孟和繪，〈五〇年代政治監獄與刑場〉及附圖，收於李禎祥等編，《人權之路：臺灣民主人權回顧》（臺北：玉山社，2002），頁 45-46。

(142) 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 114-115。

(143) 謝聰敏，〈留日學生的祖國經驗〉，《自立晚報》，1991 年 8 月 1 日。

捕。(144) 結果，謝國城、林迺敏被拘禁幾天後被釋放，朱昭陽被拘押一百日，陳成慶被拘押三百日，朱華陽、楊廷謙各判刑六年，李中志則被判處死刑。(145)

根據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書，牽涉此案者包括廖瑞發、李中志、朱華陽、楊廷謙、陳建利與陳成慶六人。判決書指廖瑞發於一九四九年三、四月間經中共臺灣省工作委員會成員王萬得之介紹，加入共黨組織。一九四九年二月初旬，李中志組織臺灣新民主自治盟，廖瑞發代李中志與王萬得及蔡孝乾聯絡，商洽指導李之組織事宜，李中志經此被介紹入黨。同年二月初旬，李中志開始約朱華陽、楊廷謙及在逃的郭德焜、何海堂等人以聚餐方式開會討論，進行組織事宜，並指定朱華陽為該盟主席、楊廷謙為該盟宣傳部長、李中志自任該盟組織部長。同年三月中旬最後一次聚餐討論時，朱華陽、楊廷謙因心懷畏懼，藉故規避參與討論，並向李中志表明拒絕參加，盟員陳建利、陳成慶則矢口否認參加組織，證物是李中志在日本共產黨黨費收據及學習提綱等。(146) 結果判決廖瑞發、李中志死刑，朱華陽、楊廷謙刑期六年，陳建利、陳成慶無罪。其中，陳成慶當時在臺大化工系擔任兼任講師，該系系主任陳華洲出名具保，並多次透過校長傅斯年催詢警備總部，陳成慶仍被拘禁了三百天後才獲釋。(147)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朱昭陽被通知到保安司令部見司令彭孟緝，彭氏訓誡一番之後，要求登報聲明解散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在保安司令部人員交下一張名單，並要求朱昭陽草擬「解散啓事」後，在劉明保釋下返家。

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中央日報》上刊登了這則解散啓事：

(144) 沈懷玉訪問、鍾玉霞記錄，〈朱華陽先生訪問紀錄〉，收於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白色恐怖事件查訪》（臺北：臺北市文獻會，1999），頁461-465。朱華陽指他受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成員郭德焜之邀，參加與該會成員李中志、楊廷謙之餐會，餐會中李中志提議成立「臺灣青年會」，朱華陽認為時機不宜而反對，但仍被判刑六年。

(145) 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120。

(146) 檔案管理局，〈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書〉，流水號000009059。判決書中指證物之一為李中志加入日本共產黨的黨費收據，殊不合理。按李中志是否加入日本共產黨即是一個疑問，竟還會留有繳交黨費的收據，顯見白色恐怖政治案件中情節之荒唐。依據童搖轍等人的說法，指出證物為日本共產黨機關報《紅旗》雜誌的繳費收據，朱昭陽回憶錄中則說是李中志從大陸帶回五星旗的海報，朱華陽說是中共宣傳品。

(147) 檔案管理局，〈請准予保釋本校化工系講師陳成慶由〉，流水號000342539。



### 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解散啓事

民國三十四年，日本投降、臺灣光復當時，我們旅日臺胞為學習國語及研究臺灣事情，以資建設起見，在東京組織一個研究團體，稱為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未幾該會會員紛紛歸臺，在臺雖有各地支部之設立，但以各在一方，各忙期業，既無連絡，復未曾集會活動。但因會員眾多，份子複雜，乃有少數會員以本會名為掩護，作反對政府之非法活動，實違本會學術研究之本旨。未免為奸匪所利用起見，特將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宣告解散，希各界人士察照，此啓

民國三十九年一月二十八日

朱昭陽 宋進英 謝國城 林迺敏 高天成 曹欽源  
魏火曜 林秀棟 吳振坤 鍾啓安 林宗義 張漢裕  
王金茂 江萬煊 李燧煤<sup>(148)</sup> (按：標點為筆者所加)

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為何會被下令解散，至今原因不明。包括朱昭陽、魏火曜、賴永祥、楊建基等人的回憶錄或口述訪問均指出，研究會成員返臺後莫不忙著各自找尋工作，未曾再集會過，朱昭陽即指出，在政府當局要求下刊登啓事，其實是「宣佈解散一個原本已經不存在的組織」。<sup>(149)</sup> 如果說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在戰後曾有任何行動，那應該是在二二八事件當時。筆者在新出土的檔案中發現，二二八事件國府軍隊增援鎮壓後的三月十日，留日臺胞團體曾聯名向立法院請願，要求嚴懲陳儀及貪官污吏、取消行政長官公署制、縣市區長民選、促進臺灣島民政治經濟自治等等，其中包括以李燧煤為代表的「新生臺灣建設會」也參與連署。<sup>(150)</sup> 但是，聯名請願的團體共有 26 個，並無積極證據可以說明研究會的解散與此事有關。

(148) 《中央日報》，民國 39 年 1 月 28 日。刊在報上的這則啟事，內容與朱昭陽所保存之手稿只有一處文字有出入，成員排名順序則大不相同。參見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 117-118。另外，成員之一魏火曜指出，當時他正擔任臺大醫院院長，當局要求他與高天成、蔡章麟三人登報聲明解散研究會，三人照辦。參見熊秉真等訪問，江東亮、鄭麗榕記錄，《魏火曜先生訪問紀錄》，頁 19。但《中央日報》所刊出與朱昭陽所保存的解散啟事，名單中都沒有蔡章麟，應是魏火曜記錯了。

(149) 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 118。

(150) 檔案管理局，〈呈為臺省二二八事件留日臺胞請願案〉，流水號 000329597。

事實上，戰後返臺之海外臺灣人所組聯誼團體而遭受白色恐怖威脅者不只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一端。具滿洲經驗的臺灣人，回臺後曾組聯誼團體「東北會」，但因政府當局的猜疑，會長楊蘭洲就常被帶到保密局約談，深受嫌疑之苦。<sup>(151)</sup>曾留學滿洲建國大學的臺灣學生組織的「愛國青年會」，也於一九四八年被「破獲」，林慶雲等多人因左傾罪名判處徒刑，<sup>(152)</sup>情形與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如出一轍，可以看出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對臺灣知識菁英的不信任態度。

延平學院以補校名義復校一年再遭挫折，校長朱昭陽被捕、副校長宋進英也在情治機關追捕下躲躲藏藏。學校乏人管理、學生人數銳減，學校生存出現嚴重危機。又值中央政府播遷來臺、社會動盪之際，以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為主所組成的校務委員會中，多數校務委員對學校前途失去信心，主張解散學校。在多數校務委員離去的情況下，只剩朱昭陽與宋進英堅持繼續辦校，於是改組校務委員會，由專兼任教師擔任。<sup>(153)</sup>

## (二)中共學委會案及其他案件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四日，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蔣經國召開記者會，宣布破獲中國共產黨臺灣省工作委員會秘密組織，省工委書記蔡孝乾、組織部長陳澤民、宣傳部長洪幼樵、武裝工作部長張志忠等四人先後被國防部保密局逮捕，該黨自一九四六年四月以來，歷經四年在臺發展之組織，包括省工委領導機構、基隆市工委、臺北市工委會、臺中區工委、臺南區工委、高雄市工委等中間機構，均已瓦解，各地支部小組被摧毀者達八十餘單位，蔡孝乾等四人並發表「告全省中共黨員書」，呼籲黨員自首。<sup>(154)</sup>

受到共產黨臺灣工作委員會被破獲的影響，相關人員相繼曝光。在李水井為首的學生工作委員會案中，共有 45 人被判刑。其中包括臺灣新生建設研究會成員楊廷椅與葉盛吉。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書中指出，楊廷椅於一九四七年五月間

(151)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曾金蘭記錄，〈楊蘭洲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5（1994年6月），頁160。

(152) 許雪姬，〈滿洲經驗與白色恐怖——「滿洲建大等案」的實與虛〉，收於氏等作，《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論文暨口述歷史紀錄》（臺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2003），頁1-39。

(153) 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151-152。

(154) 《中央日報》，民國39年5月14日。

由廖瑞發介紹參加共黨組織，與陳水木分別領導臺大及師院支部；葉盛吉於一九四八年九月受劉沼光介紹入黨，為臺大醫學院支部負責人，兩人因從事學運、擴大組織，被判處死刑，<sup>(155)</sup>十一月底於馬場町執刑槍決。<sup>(156)</sup>

從同案的黃華昌的回憶錄中，可以看到楊廷椅以「臺大工學院邱先生」化名吸收青年，鼓勵他「做為臺灣青年革命先鋒隊」的經過。<sup>(157)</sup> 低葉盛吉兩屆、經他介紹入黨的臺大醫學院學生顏世鴻，也在口述回憶中指出葉盛吉對臺灣社會的關切與對社會主義的信仰。<sup>(158)</sup>

更令人驚異的是，之前才出面到保安司令部保釋朱昭陽的延平學院董事劉明，也於一九五〇年四、五月間被捕，原因是出資協助友人蕭坤裕創辦大安印刷所，最後以資匪罪名被判刑十年，擔任工藝社總務主任的文學家王白淵也在同案中被判刑二年。<sup>(159)</sup> 雖然有臺灣省參議會副議長李萬居、國大代表游彌堅、吳三連、葛曉東、考試院考試委員陳逸松、省參議員郭國基等十人聯名上書陳情，亦無法解救劉明於危難。<sup>(160)</sup>

一九五〇年底，又有延平補校師生被捕、判刑。延平補校地理教師林水旺、數學教師林秀棟被指加入「匪幫」，躲藏在臺南縣玉井鄉農民楊鬧雲家後被捕，延平學生陳錫忠、連林山則因老師介閱「禁書」也連同入案。<sup>(161)</sup> 結果楊鬧雲等三人被判處死刑，林水旺被判處十五年有期徒刑，林秀棟等三人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連林山、陳錫忠等五人被判處五年有期徒刑，<sup>(162)</sup> 同案的延平學生楊友舜則逃亡七個月後脫險。<sup>(163)</sup>

(155) 檔案管理局，〈李水井等叛亂案〉，流水號 000010400。

(156) 《中央日報》，民國 39 年 11 月 30 日。

(157) 黃華昌，〈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2004），頁 270-271、293。

(158) 〈塵世霜白，紅雁丹心——顏世鴻口述〉，收於林世煜、胡慧玲訪問，《白色封印：白色恐怖 1950》（臺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2003），頁 205-242。

(159) 檔案管理局，〈顏錦華等叛亂案〉，流水號 000009604。有關劉明被捕經過及其所涉案件可以參考張炎憲、曾秋美訪問，張嘉元記錄，〈一個時代的遊俠劉明——劉心心口述歷史紀錄〉，《臺灣史料研究》19（2002 年 6 月），頁 210-215。劉明的獨生女劉心心認為，他父親被捕是國民黨政府對臺灣社會領導菁英一網打盡的有計劃行動的一環。

(160) 檔案管理局，〈呈為劉明懇乞保釋圖報黨國由〉，流水號 000007231。

(161) 沈懷玉訪問、鍾玉霞記錄，〈陳錫忠先生訪問紀錄〉，收於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頁 190-195。

(162) 檔案管理局，〈楊鬧雲等叛亂案〉，〈非法組織案卷〉，流水號 000463604。

(163) 楊友舜，〈敬愛的朱昭陽董事長〉，收於財團法人延平昭陽文教基金會編，《螢光曲》，頁 235-239。

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延平補校師生如驚弓之鳥。其中不乏涉案者，例如國文教師張冬芳因涉案逃亡，延平補校學生何春輝三度被逮捕審訊後被交付感化教育三年，<sup>(164)</sup> 賴永祥於一九五八年被調查局約談，訊問參加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之事，七〇年代避居美國；<sup>(165)</sup> 學校中的老師，如宋進英、林秀棟因害怕而躲躲藏藏；朱華陽在綠島坐監多年；邱永漢、黃金穗、郭德焜逃亡到香港與日本等等。<sup>(166)</sup> 一所立意培養臺灣人才的教育機構，竟長期處於風雨飄搖的困境中。

一九四九年初，延平學院復校曾經一度露出曙光，教育部長朱家驊透過延平董事劉啓光轉來電報，通知速提出延平學院設立申請文件，但因正逢國民黨政府遷臺，一九五〇年再往洽教育部，未獲答覆，後又因臺灣省政府政策暫不准設立學院，復校希望破滅。一九五三年、一九五七年延平補校董事會兩度向教育部申請成立商業專科學校，都未獲准，於是在一九五八年決定將日間部申請改為中學，終於在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一日奉准立案，補校日間部改為延平中學，招收初中及高中學生，夜間部為附設補習學校。<sup>(167)</sup> 歷經千百折難，朱昭陽等人由設立高等教育機構的初衷輾轉波折，經過十三年的努力，最後降級為中等教育機構，終於獲得政府當局准予立案。

## 六、結論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在臺灣五十年殖民統治終結，旅日臺灣菁英充滿欣喜之情，懷抱浪漫的夢想，組織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呼朋引伴要為奉獻故鄉而努力。回臺之後，因被拒於文官體系之外，乃創辦延平學院作為實踐理想的途徑。但是，學校開辦不到半年，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因不明原因被封閉，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也被追究並解散。延平學院與研究會成員在白色恐怖時期，有的因案被槍決、下

(164) 何春輝，〈我最敬愛的延平之父——朱昭陽先生與我〉，收於財團法人延平昭陽文教基金會編，《螢光曲》，頁 204-234。

(165) 許雪姬、張隆志等訪問，鄭麗榕、吳美慧等記錄，〈賴永祥先生訪問紀錄〉。

(166) 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 122。

(167)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轉呈臺北市私立延平中學申請設校計劃及董事會申請備案由〉，48/229.00-31/1/0/0/48782，教育部檔案室。張愷輝，〈延平中學的成立〉，收於延平中學創校五十週年紀念專輯編輯委員會編，《延平中學創校五十週年紀念專輯》，頁 125-126。

獄，有的明哲保身遠走異域，有的危危惴惴、抑鬱以終。當初怎麼也想不到，一片愛國愛鄉的熱血赤忱，怎會換來如此不堪的對待？

在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中飽受歧視的臺灣人，對於復歸祖國充滿期望，認為今後不必再受差別待遇，可以成為一等國民。朱昭陽回憶道：「臺灣剛光復，本省同胞歡天喜地……當時，我們旅日的省人，天天期待著能早日見到回臺之遣送船，儘早重返自己的故鄉。我們的盼望終於實現了，遠離家園的遊子，踏上故鄉的土地，投入慈母的懷抱，這種心情，可能不是局外人所能體會到的。但是我們得到的是什麼呢？雀躍的心情低沉了，省民的寄望落空了。」<sup>(168)</sup> 戰後之初臺灣人熱心學北京話、學國歌、研讀三民主義的同時，天真的認為是自己當家作主、出人頭地的時候了。對他們來說，復歸祖國就可以重作主人，擁抱祖國先要建設臺灣。豈知，前來接收的祖國官員對臺灣人，尤其是知識菁英並不信任，甚至充滿偏見。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成員邱永漢如此說道：

……當時留學日本的人們幾乎都被摒棄在職場外，……因此經過商議，決定創辦私立大學……。

然而，私立延平學院遲遲無法設立。由於行政長官公署認為我們是反政府運動的一派，不僅不允許創辦，還公然指責「接受日本帝國主義教育毒害的不法份子」。因此，創辦大學被凍結，但看在向教育廳提議此事的人面上，允許降格創辦初中和高中。

當時延平大學若成立，我打算加入教授行列……。

徬徨了大約半年，我得到的結論是，從大陸來的政府視臺灣人知識階級為眼中釘。……<sup>(169)</sup>

戰後臺灣社會要求提供青年升學機會，增設大學的呼聲殷切。儘管延平學院的創立受到極熱烈的回響，辦學初期運作狀況順暢，但卻一直受到官方阻撓。前來接收臺灣的陳儀政府以加強國語國文、三民主義、中國歷史做為戰後中國化教育政策的重點，但延平學院由留日菁英所主導，長官公署機關報乃嚴厲批判延平

(168) 朱昭陽，〈我的回憶〉，收於私立延平中學輯，《朱昭陽先生言論集》，頁124。

(169)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我的青春·臺灣 我的青春·香港》，頁77-78。

學院充滿地域主義色彩，陳儀長官也心存偏見，消極抵制學校之申請立案。二二八事件發生後，警備總部乘機打壓，迅速以學生參與事件及私藏武器等理由關閉學校。從情治機關的情報中，更可以看出政府當局對於延平學院由「東大閩」主導及「缺乏祖國意識」的憂慮。而關閉延平學院，不啻明白宣示禁止留日臺灣人菁英插手高等教育，阻絕他們爭取自主教育權的機會。

直到一九五〇年代末期，臺灣政經情勢逐漸趨於穩定，高等教育的發展受到重視，據學者的研究，從一九五四到一九六二年增加了 14 所大學、9 所專科學校。<sup>(170)</sup> 這個時期增設的公私立大專院校，主要有三個類型：一是中國大陸大專院校在臺復校者，如政治大學、清華大學、交通大學、東吳大學；一是教會學校，如東海大學、輔仁大學、靜宜文理學院等；一是配合社會與經濟發展需要設立的專科學校，如中原理工學院、淡江文理學院、逢甲工商學院，與高雄醫學院、中國醫藥學院、臺北醫學院。<sup>(171)</sup> 這個時期的公私立大學，絕大部分是外省人士或「黨國要員」所主導，臺灣人創辦的私立院校只有林挺生的大同工學院、杜聰明為主的高雄醫學院與徐千田等人的臺北醫學院。<sup>(172)</sup> 顯然在教育界，臺灣人仍未被充分信賴，只能被允許在醫學、工業等技術專業領域發展。以文法政師資為主的延平學院，等待復校多年，終究沒有生存的空間。

其次，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是留日臺灣菁英的集合體，成員之中思想多元，朱昭陽的觀察如下：

研究會雖然有共同的活動和目標，但成員的思想傾向並不一致。其中有小部分偏左，也有小部分偏右，而其相同點是一致反對殖民主義，反對被歧視，反對差別待遇，在民族主義的色彩上可以說是一致的。<sup>(173)</sup>

(170) 陳舜芬，〈戰後臺灣地區高等教育設校政策〉，收於氏著，《高等教育研究論文集》（臺北：師大書苑，1993），頁 15-51。

(171) 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臺北：正中書局，1974），頁 115-127。

(172) 淡江文理學院前身為淡江英語專科學校，首任校長張鳴（鶯聲）雖是臺灣宜蘭人，但與國民黨關係深厚，董事長是張鳴的岳父居正，學校董事會主要成員如朱家驊、鄒魯、張知本等，多為國民黨要員，所以筆者未將之視為臺灣人所創辦之學校。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頁 118。

(173) 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朱昭陽回憶錄》，頁 69。

二二八事件令臺灣人徹底失望後，研究會中部分人士轉而追尋紅色祖國。根據調查局的內部資料，二二八事件前在臺灣的中國共產黨員只有七十餘人，一九四八年春發展為 285 人，到一九四九年底已快速增加到一千三百多人。<sup>(174)</sup> 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成員如李中志、楊廷椅、葉盛吉在二二八事件後的活動與思想左傾，正是在此社會脈絡下所形成。

當時國民黨政府對臺灣人菁英處處防範，又因國共內戰中漸露敗跡，更對各種人民團體心懷疑懼，動輒出以恐怖手段對待，輕則調查解散，重則逮捕殺戮。為了奉獻臺灣而成立的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返臺後並無實質活動，卻也被下令解散，朱昭陽也因此被拘禁百日，對於這段經歷，他倍感屈辱與不堪。但是研究會的遭遇並不是特例，在那個幽黯的年代裡，團體組織僅被解散處置，竟然已經是最幸運的待遇了。

留日臺灣菁英戰後返臺亟欲一展抱負，不料遭到祖國如此對待，精神上倍受打擊。多少菁英喪生在祖國政權手中，生者則是恹恹惶惶、抑鬱一生。<sup>(175)</sup> 朱昭陽在長期噤聲之後，老來述及，仍對祖國政權充滿忿懣之情：

當時臺灣民眾對光復之期待，對光復後之幻想，有如華似錦般美麗夢想，由殖民地統治，一舉而成爲可享平等自由之國民生活，但事實上，民眾之期待，並不是簡單就可以成爲事實。……實言之，能力較低者支配能力較高者；智慧較低者領導智慧較高者，原本是歷史之鬧劇，也是一齣歷史之悲劇也。臺灣要脫離殖民地之統治實在不容易啊！<sup>(176)</sup>

更甚者，政府當局因爲恐共防共心理，白色恐怖行動鋪天蓋地而來，臺灣社會莫不膽戰心驚，而延平補校師生更是在一波波白色恐怖案件中受害甚深。就如同延平補校的受刑學生陳錫忠所說的：

(174) 調查局，《臺灣光復後之「臺共」活動》（臺北：調查局，1977），頁 31、53。

(175) 例如宋進英之子宋文彬指出，其父在二二八事件中後雖仍盡心投入延平復校工作，但長期以來精神抑鬱，儘管有黃啟瑞等邀請入市府任教育局長，終生拒入官場。陳翠蓮訪問記錄、宋文彬先生口述，2005 年 11 月 14 日。楊建基自述眼見叔父楊廷謙、楊廷椅因案下獄或槍決，好友陳成慶被捕，上司劉明也被判刑，身邊親友同儕諸多入罪，令他終日心驚，亟思自保。陳翠蓮訪問記錄、楊建基先生口述，2006 年 5 月 30 日。

(176) 朱昭陽，〈自述歷史——我的回憶〉，收於財團法人延平昭陽文教基金會編，《螢光曲》，頁 332-333。

當年政府在「寧可錯殺，不可錯放」的原則下，不知犧牲了多少菁英，這些人都是國家栽培的，卻又自己把他毀了。當年的時代背景，關心國家、批評政府的人，被認為思想左傾，或是進步份子，他們也是盼望國家、社會能更好，並不是共產黨，但是政府卻沒有雅量接受批評，動不動就戴紅帽子，製造不少冤獄。<sup>(177)</sup>

大肆株連捕殺的結果，確實達到使臺灣社會鎮懾戰慄的效果，但同時也磔殺了一整個世代的菁英人才，斷絕了人民向心。自國民黨政府接收臺灣到失去中國大陸政權，是戰後臺灣黑暗歷史的起點，而新生臺灣建設研究會與延平學院的遭遇，恰似是這段歷史的傷痛見證。

定稿日期：2006.9.12

---

(177) 沈懷玉訪問、鍾玉霞記錄，〈陳錫忠先生訪問紀錄〉，頁195。



## 引用書目

- 《人民導報》，民國 35 年 5 月至民國 36 年 2 月。  
《大明報》，民國 35 年 9 月 12 日。  
《中央日報》，民國 39 年 1 月 28 日、5 月 14 日、11 月 30 日。  
《民報》，民國 35 年 5 月至民國 36 年 2 月。  
《臺灣新生報》，民國 35 年 5 月至民國 39 年。  
私立延平學院復原籌備處，〈私立延平學院復原申請書〉，2001 年 9 月。  
陳翠蓮訪問記錄、宋文彬先生口述，2005 年 11 月 14 日。  
陳翠蓮訪問記錄、徐世通先生口述，2001 年 12 月 27 日。  
陳翠蓮訪問記錄、楊建基先生口述，2006 年 5 月 30 日。  
陳翠蓮訪問記錄、廖德雄先生口述，2001 年 11 月 3 日。  
陳翠蓮訪問記錄、賴永祥先生口述，2006 年 5 月 26 日。  
臺灣省政府教育廳  
    〈轉呈臺北市私立延平中學申請設校計劃及董事會申請備案由〉，48/229.00-31/1/0/0/48 782，教育部檔案室。  
檔案管理局  
    〈呈為臺省二二八事件留日臺胞請願案〉，流水號 000329597。  
    〈呈為劉明懇乞保釋圖報黨國由〉，流水號 000007231。  
    〈李水井等叛亂案〉，流水號 000010400。  
    〈報延平學院參加二二八事件活動情形由〉，0036/340.2/5502.3/18/002。  
    〈復民盟在臺活動由〉，0036/340.2/5502.3/18/009。  
    〈楊闇雲等叛亂案〉，〈非法組織案卷〉，流水號 000463604。  
    〈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判決書〉，流水號 000009059。  
    〈請准予保釋本校化工系講師陳成慶由〉，流水號 000342539。  
    〈據臺灣省海外僑胞救援會代表林獻堂等呈請轉給駐日聯軍統帥准予匯寄捐款並核撥專輪運送臺胞事〉，流水號 0000339311。  
    〈顏錦華等叛亂案〉，流水號 000009604。  
    〈關於在日本及朝鮮之臺灣人返臺灣案〉，流水號 0000339311。  
宋文彬  
    1998 〈先父宋進英二三事——在東京及創辦延平前後時期〉，未刊稿。  
林獻堂  
    〈灌園先生日記〉，民國 34 年 10 月至民國 39 年 12 月，未刊稿。  
許雪姬（訪問）、王美雪（記錄）  
    〈張賴朝邦先生訪問紀錄〉，未刊稿。  
許雪姬、張隆志等（訪問）、鄭麗榕、吳美慧等（記錄）  
    〈賴永祥先生口述訪問紀錄〉，未刊稿。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  
    1993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朱昭陽  
    1990 〈我的回憶〉，收於私立延平中學輯，《朱昭陽先生言論集：螢之光》，頁 119-132。臺北：私立延平中學。

- 2003 〈自述歷史——我的回憶〉，收於財團法人延平昭陽文教基金會編，《螢光曲》，頁 315-340。臺北：延平昭陽文教基金會。
- 朱昭陽（口述）、林忠勝（撰述）  
1994 《朱昭陽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
- 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賴澤涵等）  
1994 《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臺北：時報出版公司。
- 何春輝  
2003 〈我最敬愛的延平之父——朱昭陽先生與我〉，收於財團法人延平昭陽文教基金會編，《螢光曲》，頁 204-234。臺北：延平昭陽文教基金會。
- 何清欽  
1980 《光復初期之臺灣教育》。高雄：復文出版社。
- 何鳳嬌（編）  
1993 《政府接收臺灣史料彙編（下冊）》。臺北：國史館。
- 李汝和  
1970 《臺灣省通誌卷十光復志國籍恢復篇》。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李東輝  
1946 〈私立延平學院訪問記〉，《臺灣學生》1: 10-13。轉引自延平中學創校五十週年紀念專輯編輯委員會編，《延平中學創校五十週年紀念專輯》，頁 52-53。臺北：私立延平中學。
- 沈懷玉（訪問）、鍾玉霞（記錄）  
1999 〈朱華陽先生訪問紀錄〉，收於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白色恐怖事件查訪》，頁 927-936。臺北：臺北市文獻會。  
1999 〈陳錫忠先生訪問紀錄〉，收於呂芳上主持，《戒嚴時期臺北地區政治案件相關人士口述歷史——白色恐怖事件查訪》，頁 387-398。臺北：臺北市文獻會。
- 汪其楫  
2004 〈大久丸上同船君子〉，《聯合報》，民國 93 年 8 月 4 日。  
2004 《舞者阿月》。臺北：遠流出版社。
- 私立延平中學（輯）  
1990 《朱昭陽先生言論集：螢之光》。臺北：私立延平中學。  
延平中學創校五十週年紀念專輯編輯委員會（編）  
1996 《延平中學創校五十週年紀念專輯》。臺北：私立延平中學。
- 林木順  
1990 《臺灣二月革命》。臺北：前衛出版社。
- 林世煜、胡慧玲（訪問）  
2003 《白色封印：白色恐怖 1950》。臺北：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
- 邱永漢（著）、朱佩蘭（譯）  
1996 《我的青春·臺灣 我的青春·香港》。臺北：不二出版社。
- 侯坤宏、許進發（編）  
2004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十六）》。臺北：國史館。
- 高俊明、高李麗珍（口述），胡慧玲（撰文）  
2001 《十字架之路：高俊明牧師回憶錄》。臺北：望春風出版社。
- 張炎憲、胡慧玲、曾秋美（採訪記錄）  
2000 《臺灣獨立的先聲：臺灣共和國》。臺北：吳三連基金會。
- 張炎憲、曾秋美（訪問），張嘉元（記錄）  
2002 〈一個時代的遊俠劉明——劉心口述歷史紀錄〉，《臺灣史料研究》19: 198-215。

張炎憲、曾秋美（訪問），賴信真（記錄）

2005 〈延平學院口述史——簡永昌先生訪問紀錄〉，《臺灣史料研究》26: 170-179。

張炎憲等

1995 《臺北南港二二八》。臺北：吳三連基金會。

2006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臺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教育部教育年鑑編纂委員會（編）

1974 《第四次中華民國教育年鑑》。臺北：正中書局。

許雪姬

2003 〈滿洲經驗與白色恐怖——「滿洲建大等案」的實與虛〉，收於氏等作，《戒嚴時期政治案件專題研討會論文暨口述歷史紀錄》，頁 1-39。臺北：財團法人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基金會。

許雪姬（訪問），吳美慧、曾金蘭（記錄）

1994 〈楊蘭洲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5: 143-160。

許雪姬（訪問）、曾金蘭（記錄）

1995 〈潘作宏、翁繡花夫婦訪問紀錄〉，收於許雪姬、方惠芳訪問，《高雄市二二八相關人物訪問紀錄（上）》，頁 417-431。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許雪姬、丘慧君（訪問），丘慧君（記錄）

2003 《許丕樵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郭海鳴

1952 《臺灣省通志稿·卷十·光復志》。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陳三井、許雪姬（訪問），楊明哲（記錄）

1992 《林衡道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陳君愷

1996 〈荒野中的螢光——延平學院的歷史地位〉，收於延平中學創校五十週年紀念專輯編輯委員會編，《延平中學創校五十週年紀念專輯》，頁 87-93。臺北：私立延平中學。

陳里攀

2003 〈跟隨同行六十年〉，收於財團法人延平昭陽文教基金會編，《螢光曲》，頁 240-244。臺北：延平昭陽文教基金會。

陳孟和（繪）

2002 〈五〇年代政治監獄與刑場〉及附圖，收於李禎祥等編，《人權之路：臺灣民主人權回顧》，頁 45-48。臺北：玉山社。

陳舜芬

1993 〈戰後臺灣地區高等教育設校政策〉，收於氏著，《高等教育研究論文集》，頁 15-51。臺北：師大書苑。

彭明敏

1995 《自由的滋味》。臺北：李敖出版社。

曾秋美（訪問）、施妙旻（記錄）

2005 〈延平學院口述史——林竹堂先生訪問紀錄〉，《臺灣史料研究》26: 180-195。

曾秋美（訪問）、張嘉元（記錄）

2001 〈李雲騰先生訪問紀錄〉，收於私立延平學院復原籌備處，〈私立延平學院復原申請書〉。

湯熙勇

1991 〈臺灣光復初期的公教人員任用方法〉，《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4(1): 391-425。

2005 〈恢復國籍的爭議：戰後旅外臺灣人的復籍問題(1945-1947)〉，《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17(2): 393-437。

- 黃富三、許雪姬（訪問），蔡說麗、朱明發（記錄）  
1993 〈廖德雄先生訪問紀錄〉，《口述歷史》4: 55-74。
- 黃華昌  
2004 《叛逆的天空：黃華昌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
- 楊友舜  
2003 〈敬愛的朱昭陽董事長〉，收於財團法人延平昭陽文教基金會編，《螢光曲》，頁 235-239。臺北：延平昭陽文教基金會。
- 楊威理（著）、陳映真（譯）  
1995 《雙鄉記》。臺北：人間出版社。
- 楊國光  
2001 《一個臺灣人的軌跡》。臺北：人間出版社。
- 楊基銓  
1996 《楊基銓回憶錄》。臺北：前衛出版社。
- 熊秉真等（訪問），江東亮、鄭麗榕（記錄）  
1990 《魏火曜先生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  
1968 《臺灣省通志卷首下大事記》。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編印）  
1946 《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二次大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
-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編）  
1946 《陳長官治臺言論集第一輯》。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
-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編）  
1946 《臺灣省參議會第一屆第一次大會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施政報告》。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秘書處。
-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編）  
1947 《臺灣省教育概況》。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教育處。
- 臺灣省長官公署人事室（編）  
1946 《臺灣省各機關職員錄》。臺北：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人事室。
- 蔣渭川  
1991 《二二八事變始末記》。臺北：家屬自印。
- 調查局  
1977 《臺灣光復後之「臺共」活動》。臺北：調查局。
- 謝聰敏  
1991 〈留日學生的「祖國經驗」〉，《自立晚報》，民國 80 年 8 月 1 日、2 日。  
1993 〈二二八事變研究——二二八事變中的黨政關係〉，收於氏著，《黑道治天下及其他》，頁 143-169。臺北：謝聰敏國會辦公室。
- 簡筌簧  
1996 〈光復後政府接運旅日臺胞返籍之探討〉，收於國史館編，《中華民國史專題論文集第三屆論文集》，頁 1-19。臺北：國史館。
- 藍博洲  
1991 《沉屍·流亡·二二八》。臺北：時報出版社。

## Vision and Frustration of Post WWII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The Case of the Yan-Ping College

Tsui-lien Chen

### ABSTRACT

When Second World War ended in 1945, the Taiwanese elites in Japan were exultant. They wanted to return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organized the Reborn Taiwan Reconstruc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RTRRA) so as to make contributions to their homeland. After their return, they established the Yan-Ping College which received enormous welcome from Taiwanese society. However, within less than half a year, the school was ordered to close. During the White Terror of the 1950s, the RTRRA was also forced to dissolve.

By documenting the fate of the above-mentioned groups, the article strives to explore the expectations and disappointments of the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early postwar era. While the education focus of Chen Yi's government was "Chinese-ness," the Yan-Ping College, which was administered by Japanese-educated intellectuals and attended by Taiwanese students, was suspected for teaching regionalism and separatism. The authority sent secret agents to monitor the school, and, after the 2.28 Uprising, found an excuse to shut it down.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d not trust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would not allow them to meddle in higher education, nor to let the natives design their own curricula. This was the real reason why the Yan-pin College was closed.

In order to forestall the threat of Communism,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used terrorist means to suppress the Taiwanese society in the 1950s. Even though it was more or less a defunct organization, the RTRRA was requested to dissolve. As so many other Taiwanese intellectuals who were victimized during the White Terror, the instructors and students of Yan-Ping College also suffered deeply in the 1950s. Wanton arrests and murders created a dreadful pall falling all over the island, as the KMT regime decimated a generation of talented and better-educated Taiwanese. But the horror had also alienated the populace for the years to come.

**Keywords:** the Reborn Taiwan Reconstruc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 (RTRRA), the Yan-Ping College, the 228 Uprising, the White Terror.